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 (甘) LK000046

教学参考

JIAO XUE CAN KAO

- 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问题与应对
-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
-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指南
-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主办

6
2021

教学参考

2021年第6期
(总第692期)

2021年12月25日编印

主 编 杨文福

副 主 编 鲜 鹏

高继明

责任编辑 张雅丽

发送范围

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Contents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问题与应对 郝凤等(1)

◎党建研究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
王易(7)

党内法规建设的源头及历史影响 张海涛(16)

◎经济论坛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指南 黄群慧(21)

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考 宋大伟(26)

◎“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 陆益龙(33)

◎社会学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蔡昉(41)

◎他山之石

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基于英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任继球(47)

◎新书推介 (54)

◎刊中报

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的主要经验等8则 (28)

◎2021年《教学参考》总目录 (56)

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问题与应对

郝 凤 张志丹

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世界产生如此广泛深刻影响的科学意识形态,但是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并非轻而易举、如人所愿。即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难度依然不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让它不仅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充满诗意和美好的观念形态,还成为一种指导人民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人们能够通过体力、脑力、情感等劳动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并能够自由调控闲暇生活时间、不断扩展生产生活空间,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这样的一种美好期许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分析之上。需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界定、难点、主体和践行等一系列问题加以阐发分析。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的阐释,首先我们需要回答生活方式是什么?作为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的复杂概念。从广义上来说,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一定价值观指导下的,包括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在内的人类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总称。具体来讲,限指日常生活领域的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总的来说,生活方式组成要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活观念,是人们对待社会生活所持的基本看法、观点和态度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生活领域的

具体体现。生活观念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受到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一定的生活观念一旦成熟定型,就会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实践。二是生活主体,生活方式诸要素中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它包括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群体主体可分为社会集团(阶级或阶层)和整个社会,生活主体基于一定的生活观念和自身生活需要,运用劳动等生活手段获取生活资料,从而实现生活目的。三是生活资料,包括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物质生活资料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规定和制约着主体的生活和消费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生活资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包括物质生活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资料在内的,用于生活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四是生活时间,除劳动时间以外的,用于消费生活资料,从事休闲娱乐和社会活动等的时间。生活时间的长短跟生活活动的节奏快慢成负相关,二者也从侧面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发展程度。五是生活空间,生活主体开展生活活动的范围,它包括人与人关系波及的范围和人进行活动的区域范围。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生活空间日益扩大,外部自然环境变化和科技的更新迭代对生活空间的影响也愈发显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大基本范畴同时被提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

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一定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与该社会形态性质一致的社会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来,科学技术带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日趋实证化、功利化,逐渐悬置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上,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式微,缺乏对生产、生活、生态等深层次的关照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道精神、批判精神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生产和生活,如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融入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重新建构了生活世界;卢卡奇、赫勒、列斐伏尔等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批判性观审,列斐伏尔认为:“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卷入了异化”;“生活形式”则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理论中重要的主线之一,但他并没有围绕“生活形式”展开解释,而是将其铺陈在世界图景、语言游戏等哲学概念中,引导思考上路。西方生活方式理论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破除,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是生活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自觉地从物质和精神资料的生产,自由支配生活时间,共同拓展生活空间,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活动形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基于一定物质条件的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它既集中于意识形态领域显性存在并发挥作用,又隐藏在社会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通过人们衣食住行等承载并表现。当然,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范畴,由于社会主义正在建设和逐步完善中,生活方式本身带有时代性、阶段性特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追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生活方

式基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发展的状态中,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客观的存在,而是一个不断超越现实生活状况的社会生活样态,需要同步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重新定义,不断更新延展,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走出来,无法一下子穷尽其本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面临的问题

(一) 资本运行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与之同向同行,反而为资本的逻辑所裹挟,在日常生活领域最常见和最有害的是“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消费文化借助新媒体营销,将生活方式与消费等同,生活方式概念无形中被偷换成消费概念。眼花缭乱的广告、各式各样的推广让人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总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消费者需要什么,导致其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与自身有限的时间精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冲突。资本以“获利”为原则取向“嵌入”社会,并企图将资本逻辑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犹如恶魔的触角一般逐渐控制着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本深谙人性,它们一边尽情地撩拨消费欲望,一边巧妙有效地控制供给,消费者被无情地按在地上鞭笞。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却陷进物质的陷阱,金钱成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生活中对金钱的需要成了唯一的需要,人沦为资本的奴隶,匍匐在资本的统治之下。马克思深刻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成为“普照的光”,获得了“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过分商品化、资本

化。究其实质,是资本对其他生活领域的非法僭越,导致个体经济理性的释放和张扬,并挣脱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道德情感约束后的一种“必然”。金钱社会被迫让人接受,人的主体性逐步失落,导致了人的物化、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活方式的异化。

(二)文化认同失范

社会飞速发展,生活日新月异,每一个人都感慨见证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情感上的共鸣却未能完全转化为理想信念上的信服,甚至有人质疑中国搞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等错误论调也是如影随形。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生活快速更迭,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和“主流”同时存在的“浪潮”奔腾不息,整体的文化环境变得更加快餐化、多元化,这种速成的文化从策划、包装到营销等过程无一不渗透着功利性。由于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多元信息渠道的强烈冲击,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上的唯实证主义倾向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历经长期的完善和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增益,加之传播媒介的融合更新,早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精微层面,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惯例。受“欧风美雨”“西化”“分化”的影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变成生活观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人们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总是无形而又猖狂地迫使人们接受它。没有强有力的精神指引,纷扰的多元文化极易使得人们置身精神荒漠,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物质丰饶与精神贫困并存的“无言结局”。

(三)生产生活失衡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首要前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

相互关系。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科技赋能,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也成为各个国家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在这方面我国也曾走过一些弯路,1958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向大自然开战”等,想努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这种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无节制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由于一味地发展经济,忽视自然资源保护,也导致了生态危机。东北的黑土地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3块黑土地之一,长期以来因重用轻养,高强度开发利用等原因,东北黑土层平均每年减少1厘米,生态功能逐年下降,造成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环境关系的紧张与异化。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人们也在无形中自我消耗,过度劳动造成人的情感耗竭、工作倦怠等负向效应,人与人关系日渐疏离。社会上部分劳动者的身心处于严重疲劳的状态,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给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过度劳动带来的伤害超过了个体甚至波及到整个家庭及其社会关系。中国人民素来以勤劳勇敢闻名于世,然而人不是机器,劳动力不是无限供应的,需要再生产,竭泽而渔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使人陷入内耗和虚无的怪圈。劳动本身是一种幸福,然而过度劳动却消解了劳动带给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变成了机械的、应付的、毫无创新性可言的枷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存状况,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异化劳动,即“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

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进入21世纪,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上满足的同时保持精神上的欢愉,高压短视的生活方式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绝大多数人追求和向往的美好生活背道而驰。

三、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

(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相互统一

物的尺度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的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主动驾驭市场管控资本,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消费领域着眼于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削减人无节制的消费欲望,倡导绿色消费,超越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才是真正的主人,权力听命、受制并服务于资本,资本逻辑是社会运行的主要逻辑,资产阶级政党真正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是面向大众的,讲究的是以人为价值导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我们需要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两面来看,它不是“特殊”到可以脱离人类生产生活的“另类”,而应是立足时代,融通中外,和人类优秀文明具有共通之处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未来样态。

马克思主义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成为生活方式,不可能主体无涉,除了国家、社会层面的久久为功,绵绵发力,也需要同个人积极努

力相结合。需追问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需抓关键抓具体,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者、青年大学生等群体是领跑者,广大人民群众是并行者。“究竟如何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构建新的存在状态呢?……但最主要的是,必须老老实实在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首先要让关键群体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带头学习和践行,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强化角色定位,关注生活细节,内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带头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重要助推器。就现阶段而言,美好生活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差异性,它包括物质和精神、认识和实践等多重维度。必须紧扣现代化主题主线,对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直面中国社会问题,在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科学化元素,革故鼎新、移风易俗,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培育适宜土壤。

(二)理论指导和价值引领相互彰显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思想供给的源头活水,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始终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实践变化和科技进步,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创新、有所完善。“指导一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学说,也可以指导相应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让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首先要牢牢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理论创新前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扎根中国大地,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活性,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张力和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常常不是在意识形态之内,而是在看起来是意识形态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马

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拉康曾经说过,社会辩证法中的人类认知取决于“微观现实”,即人类每天的基本生活事实:人们使用相互宣称的东西,以及相互感染的小事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及创造性实践中汲取能量、总结反思、提炼升华。

倡导一种生活方式,最表层是提倡一种生活理念,深层次倡导的则是价值观念。然而理论与认知之间并不是一一等同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距离,那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成为普遍的阶级意识呢?要有思想层面的教导,进行价值观层面的引领纠偏。第一,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斗争,鞭辟入里地阐明其中的谬误,用理论和事实将错误思潮的危害性呈现在人们面前。组织大量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工作者撰写批驳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理论斗争,把道理讲深讲透,揭露错误思潮的虚伪外衣,在与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不断锤炼不断创新,澄明自己的价值理念,争取更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第二,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宁愿培养一百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要培养千万个内心固然虔诚却无自己思考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让有信仰的人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去认识分析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让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习惯,最终落到实际生活中,在生活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第三,信仰总是包含着信心在内,生活方式上要推动价值观自信,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挖掘价值观自信的生活基础和实践根基,着眼于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让群众从现实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意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优势,才能更好地推动

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落地生根。

(三) 劳动生活和闲暇生活相互支撑

“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新时代,劳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充分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本质,将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和每个人的自我建构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新的时代要求。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劳动实现。为此,必须摒弃工具理性思维,不断进行科技创新,释放劳动力,实现科学技术对人的解放。如今人工智能正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产品也在逐步走入千家万户,大到仿生机器人、无人驾驶,小到扫地机器人、智能音响设备等正逐步由理念变为现实。如何规避智能资本化和资本智能化,让智能化助力人成为真正的人正变为新的研究增长点。

人是通过劳动不断超越本能而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过去人们对劳动幸福的理解,往往侧重从劳动的结果来评定来判断是否有幸福感、享受感,或者又只因劳动过程的辛苦程度就简单地否定劳动获得幸福,劳动成为享受的可能性。实际上,两者不可偏废,劳动理应是劳动的对象性和对象化过程的统一。劳动既要成为享受的过程,也必须能够提供可持续享受的基础,在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中达到一种幸福的状态,这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区别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相比之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会让劳动者产生巨大的虚无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全局感,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使劳动者越来越难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分工程度高,部分人不得不日日夜夜承担着“拧

螺丝”的角色。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是全面的、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它抛弃了人本主义的“抽象价值悬设”,立足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立场、高扬科学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扬弃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实现劳动向人的本质的复归,劳动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劳动创造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劳动主体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在科学理论指引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合理分工,各尽其责,生活资料有效供给和合理化配置,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劳动者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得以不断提升,体会到归属、需要和自我实现,每位劳动者都可以在劳动中成长,在劳动中实现人生出彩。

(四) 内化认同与外化实践相互结合

日常生活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出发点,也是归宿。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悬置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之上,其根本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空洞缺乏吸引力,而在于大众所认识和接收到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落地”日常生活,从思想理论层面转向对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问题的研究,让马克思主义从“意义世界”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当前极为迫切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无涉的政治符号,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理论,它面向大众出场,就是要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唯有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才能持久。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内化为大众的理想信念,为人们认识日常生活提供指导,使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从中感悟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追求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具体

的历史的统一,是必然的归宿。马克思主义融入日常生活,不仅需要内化为理想信念,还需要外化为实践行动。传统的生活方式是群众长期以来生活的积淀,他们每天重复相同类似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生活方式“惯习化”,有些甚至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阻滞力。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不能忽视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推进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协同转化。树立命运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世界眼光、全球视野,为谋求世界大同不断努力。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将人与自然视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推动双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推动“自然——人——社会”的互利共生,实现人诗意地栖居和人类共同体的繁衍生息。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人民群众新的日常生活世界,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将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植根和培育在人的行为规范和日常器物中,使个体挣脱传统生活方式的羁绊,在生活中感知和领悟科学思想的伟力,跳跃“KAP”(knowledge - attitude - practice)鸿沟,形成百姓日用之学的做法,形成新时代的家训、家风、家规等一系列体系规范,在实践中经年日久转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为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思想的引领和参考的坐标系,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重要基石。

(摘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郝凤,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 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

王 易

习近平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的英勇奋斗史，就是一部革命精神的传承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的不同历史阶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政治文化，所创造和形成的彰明党的发展脉络的价值理念、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系统。它在亮明系列具有时代特点和鲜明特色的精神坐标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的“红色肌体”下深厚的“遗传基因”。

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实践中建树独特的精神谱系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熔铸锻造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接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它以独特的精神形态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精神特质，连缀起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奋斗历程的内在精神理路。

（一）中国共产党精神发展的百年纵贯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历史时空的变换中，紧扣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循序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奏响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强音，熔铸了摆脱困境、浴火重生的精神元素，形成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精神。该时期有具有开端意义的红船精神，有反映革命道路探索和政权建设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苏区精神、西柏坡精神，有彰显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的长征精神、伟大抗战精神、红岩精神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以巩固新生政权、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为主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也从革命向建设转变，孕育了自力更生、艰辛探索的精神元素。该时期有捍卫和平正义、保卫新生政权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有乐观豪迈、战天斗地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有独立开展科研探索的“两弹一星”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没有现成方案和借鉴的前提下，面对风险挑战和自然灾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拓展了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精神元素。该时期形成了开拓创新的特区精神、伟大改革开放精神，面对自然灾害敢于挑战勇于胜利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以及彰显大国形象的奥运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置身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境遇,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奋斗实干的精神元素。代表性的精神有反映新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三牛”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向“卡脖子”核心领域进军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等,镌刻历史画卷的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

(二) 中国共产党精神分布的多维延展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在横向分布上集中凝结于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事件、科研攻关和奋进实干等重要分支。其一,以英雄模范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代又一代英雄模范在接续奋斗中的精神塑造和展示,张思德、焦裕禄、雷锋等名字已然深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们所展示的精神既是英雄模范个体精神的表达,也是中国人民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二,以典型地域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南湖、井冈山、苏区、延安、沂蒙、红岩、西柏坡、红旗渠、大庆、特区等典型地域,刻录着中国共产党不断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足迹。这些精神不仅吸收内化了生长地的精神禀赋,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主攻方向和战略依托。其三,以历史事件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绘成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有革命斗争的长征、抗战、抗美援朝,有抵御灾害的抗洪、抗震救灾、抗疫,有重要时刻的改革开放、北京奥运等。这是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写照,更是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实际优势的彰显。其四,以科技工程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憧憬。在封锁堵截的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发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科技人员隐姓埋名、自主研发、自主创造,先后攻克“两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北斗工程、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工程等。其五,以奋进

实干凝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奋进实干渗透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始终,体现在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事件以及科研攻关等不同领域,除了上述精神有所体现外,还集中于劳模精神、志愿者精神、“三牛”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

(三)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整体样态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整体样态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发展百年纵贯和中国共产党精神分布横向延展的系统综合。从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原点,以百年接续的纵向发展为纵坐标,以英雄模范、典型地域、历史时刻、科研攻关、奋进实干交织叠加的横向分布为横坐标,呈现出立体多维的整体谱系图。第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精神的集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各种精神连缀的结果,二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并不是各种精神的机械堆砌,在保有各种精神所蕴含的时代特质的同时,以不同精神所体现的共生特质为分支,有机串联、整体反映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第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以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伟大实践的滋养。任何精神形态的孕育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也不例外,它必然延续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本色,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与文化,并融汇特定时空境遇的鲜明要求,随着长期的实践过程逐一酝酿继而先后串联。第三,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沿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而形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不仅鲜明揭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也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主线和方向。可以说,无论哪个时期,不管什

么领域,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无不凝结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表1 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

时期	英雄模范	典型地域	历史时刻	科研攻关	奋进实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张思德精神 杨靖宇精神 刘胡兰精神 杨根思精神 罗盛教精神 白求恩精神	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 古田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 南泥湾精神 沂蒙精神 西柏坡精神 红岩精神 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八一精神 长征精神 伟大抗战精神	/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 铁人精神 好八连精神 王杰精神	红旗渠精神 大庆精神 大寨精神 北大荒精神 塞罕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万隆精神 西迁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	/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女排精神 孔繁森精神 杨善洲精神	特区精神 老西藏精神	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伟大抗洪精神 抗击“非典”精神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奥运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 北斗精神	劳模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李保国精神	上海精神 “两路”精神 丝路精神 莫高精神 右玉精神	伟大抗疫精神	航空报国精神 新时代北斗精神 探月精神 中国载人深潜精神 科学家精神	志愿者精神 “三牛”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企业家精神 愚公移山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一脉相承交融互通的精髓要义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顽强拼搏、奋勇前进的精神写照,是由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征的不同精神共同构成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整体,具有一脉相承、交融互通的共生特质。把握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髓要义,应该紧扣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价值意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聚焦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民情怀、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和道德品质等角度深度挖掘。

(一)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

本。”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钙”,就会得“软骨病”;没有“钙”,也就毫无精神可言。可以说,理想信念是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脊梁的支柱。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深层内核。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虽然是由孕育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表征着不同的精神密码的多种精神连缀而成,但是其中理想信念的精神内核是一以贯之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探索出适应中国实践的革命道路。同时,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

产党人鲜明的标识。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纵使明白“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深知“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所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其最深层次的内核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理想信念凝练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相通相融的共性特征。理想信念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各个精神坐标。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由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凝聚起点燃中国革命的火种。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为思想精髓,推动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的“红船”起航,标明了以理想信念为内核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历史起点。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革命低谷、挫折失败时,依然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保存革命火种,先后塑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精神结晶,是为实现最高理想而探索的革命道路在精神层面的具体体现。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核心,由革命年代生发,延续至建设时期,直至新时代的今天,不仅鲜明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精神内核,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的深刻写照。

(二) 祖国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

习近平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爱国,是每个人对祖国深厚情感的自

然表露,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生动展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祖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本质核心。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情感积淀,已成为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里的精神基因。爱国主义、祖国至上不是空洞的,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使命担当。中国古代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与近代所遭受的屈辱沉沦形成强烈对比,让中华民族有了较之于任何民族都更为强烈的复兴意愿。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交付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把祖国至上作为精神动力深深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所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其最集中的核心就是始终唱响在百年征程上的主旋律——爱国主义。

祖国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百年伟大实践中的集中体现。爱国主义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跃动的主旋律。抗战烽火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指引下投身抗日实践。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展现了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出了国威军威,夯实了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立足世界舞台的底气。祖国至上不仅表现为对祖国山河寸土不让的革命斗志,还表现为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倾心奉献。王进喜在艰苦创业中,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铸就了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元勋们冲破阻挠毅然回国,以强烈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奠基,并始终激励着

中国科研人员把个人理想焊立在祖国科研攻关的前沿,在实现中华民族“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梦想探索中,铸就载人航天精神、航空报国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等。祖国至上作为鲜明的主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形成发展始终,构筑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精神世界。

(三)携手人民辟江山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服务人民、奉献人民的生动实践,融汇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中,鲜明地体现着携手人民辟江山的为民情怀。

为民情怀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鲜亮底色。“人民”一直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为民情怀是始终聚焦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奋斗目标的情感体现。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奋斗目标,它深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整个图谱。为民情怀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底色的鲜明彰显。从马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到列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再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无不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本色。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刻在自己的精神谱系中。为民情怀还是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政治优势的具体表征。从仅有12名代表的南湖红船,到如今9191.4万党员的时代巨轮,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像丝带一样,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支脉。

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始终。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每一个精神坐标无不蕴含着人民属性和为民情怀。在探索革

命道路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苏区精神指引下,蹚出了一条从“星星之火”发展壮大为“燎原之势”的革命道路。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重要阶段,不仅在于确定了正确思想路线,还充分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谱写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篇章。在沂蒙红色土地上,沂蒙红嫂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粒米、最后一个儿子交给中国共产党,诠释着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用实际行动刻画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的真实模样,铸就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精神形象。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这场殊死较量中铸就了彰显生命至上光芒的伟大抗疫精神。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初心和使命,始终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继续朝着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前进。

(四)敢闯新路育新篇的开拓创新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作为中华民族的固有禀赋,也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中,增添了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干不服输的韵味。

开拓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鲜明品格。开拓创新作为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沉淀和文明积淀的结果。正是变革和开放的精神传统,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表征着中华民族革故鼎新、涤秽布新、守正创新的特质。开拓创新作为最独特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整体脉络,是历史底蕴和时代表征的有机统一,既有深厚的传

统感,又有浓厚的现实味。浓厚的历史底蕴是开拓创新特质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生命依托,时代现实是开拓创新特质得以表露和彰显的活力源泉,开拓创新的特质在动态的历史传承中被生动地勾勒出来。开拓创新作为最显著的标志,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特质的同时,也着意增添了“闯”劲,标识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开拓创新的鲜明品格。

开拓创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生机活力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共产党人在开拓创新的实践中构筑精神世界,同时在精神世界滋养中积淀创新特质。受制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前期吃尽了城市中心论的苦头,但是开拓创新的禀赋使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把“敢创新路”赫然刻在井冈山上。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只有改革开放、开拓创新,才能冲破横亘在前进路上的荆棘和藩篱。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兴办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闯出了一条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铸就了“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使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的开拓创新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步步走来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跨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五) 奋发图强谋复兴的艰苦奋斗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深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精髓之中。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突出本色。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无论是“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寓言故事,还是“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古英雄多磨难”等古训格言,其中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一直都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领导人民实干兴邦,在战乱频仍、山河破碎中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艰苦奋斗,在风险密布、挑战丛生中艰苦奋斗,才使得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从根本上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赓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艰苦奋斗体现出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永不懈怠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始终浸润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基本色调。革命战争年代,“困苦”二字写满了祖国大地。八路军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向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铸就西柏坡精神,敲响避免“其亡也忽焉”悲剧的警钟。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一部林县志,满卷旱荒史”的处境,林县人民靠双手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威胁,中国人民自主研发,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期间铸就的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等,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直面自然灾害,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凭借艰苦奋斗,阻击了洪水、地震、疫情,把伟大抗洪精神、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伟大抗疫精神镶嵌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中。面对困扰中国乃至世界的贫困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尽锐出战,不仅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而且锻造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赓续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谱系。一切伟大成就都是艰苦奋斗的结果,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需要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续写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新的辉煌篇章。

(六)崇德向善扬正气的道德品质

习近平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所以具有穿越时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真实地塑造英雄之“形”、诠释模范之“神”,汇聚向上向善的强大道德力量。

崇高道德品质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人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伟大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又是当代社会最具感染力和感召力的道德巨人。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是靠着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和廉洁,中国共产党历经无数艰险和磨难依然矗立时代前沿。修身自律,保持节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严三实”“八项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修身慎行、怀德自重的集中彰显,始终镶嵌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敢于斗争,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外血气方刚,向内地也绝不手软,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同自身存在的顽瘴痼疾和积习积弊、安逸享乐和不思进取的消极心态,以及若隐若现的“关系网”和若明若暗的“潜规则”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义担当,锤炼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所彰显的崇高道德品质。

道德品质由始至今渗透于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深层肌体之中。崇高的道德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情感、意志、人格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每一精神坐标都彰显了先进人群在特定环境和特定考验面前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和道德践履。焦裕禄、雷锋、孔繁森、杨善洲……这一连串的名字始终闪烁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缺氧不缺精神”……言语中透露着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忠诚朴毅。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道德品格还体现在自觉自律的行动中。行军途中老百姓的苹果纹丝未动,“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苹果有精神”的故事昭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道德自觉。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举止是崇德向善的表露和彰显,那么壮士断腕、刀刃向内刻画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崇德向善的决心和果敢。针对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时刻绷紧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这根弦,以彻底自我革命的魄力,建筑思想建党的古田精神、抵挡糖衣炮弹袭击的西柏坡精神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修身慎行、怀德自重、廉洁自律没有“暂停键”,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所彰显的道德修养,始终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可忘记。

三、在新时代征程上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支柱。置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境遇,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既要重温精神史诗、知晓走过的来时之路,也要积蓄精神力量、直面未来的壮志山河。

(一)植根历史深处,挖掘滋养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基因链”

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印有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标识。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应该放置于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土壤中,深挖滋养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历史精华,增进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历史自觉。

在中华民族文明中明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根”在哪里。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和不竭动力,就是中华民族在实践活动中,尤其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斗争中,形成的反映心理素质、思想感情、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的民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精神已经融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生命肌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深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养,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关系来看,民族精神涵育中国共产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从民族精神这一渊源中传承创新。

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接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观念,标识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也必然渗透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中,镶嵌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诸如仁者爱人、民为邦本、天下大同、革故鼎新、知行合一等文化精华,都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中找到不同的时代表达。

在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把握贯穿始终的不变文化内核。在中华5000多年文明发展的孕育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从其生发阶段就已然注入了彰显中国共产党精神底色的内核。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虽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随着历史演进和时代变迁呈现出变动之势,但是其中一以贯之的精髓要义始终渗透于其中,尤其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祖国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携手人民辟江山的为民情怀、敢闯新路育新篇的开拓创新、奋发图强谋复兴的艰苦奋斗和崇德向善扬正气的道德品质等,一脉相承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由始及今地渗透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血脉之中。

(二)纵览百年历程,厘清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的“路线图”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精神产物,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除了要在滋养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渊源上下功夫外,还要紧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在百年历程中,知晓“从哪里来”、明白“向哪里去”,厘清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的基本态势,增强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规律认知。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焕发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时代意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延续民族精神的同时,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意蕴,彰显着鲜明的理论特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可以说,伴随着中国实践一路走来的系列精神,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能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得以培育和传承的思想指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并未阻断传统精神的延续,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在培育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凝练和传续。

时代精神牵引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时代的浪潮中传续。作为特定历史时期“风向标”的时代精神,标明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发展的时代方向。“一切民族精神都曾经是一定历史阶段中带动潮流、引领风尚、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一切时代精神都将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步融入民族精神之中。”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既要弘扬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又要弘扬不同时代境遇所生发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民族精神在现当代历史中震撼人心的新表现,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新内涵,使中国精神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疏浚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源”与“流”。

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为基点创造新的精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或赋予原有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或基于先进模范、重大事件等提炼新的精神。每一种精神都有丰富的内涵和呈现方式,虽然概括出由几个特定概念所构成的具体表达,但都不是随意添加的结果,而是从大量人物事件中具体抽象的结晶。不同精神其鲜活的个性特征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动态变化。比如大寨精神因历史原因而被定格在时光隧道中,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内涵随着时代变迁散发出新的光芒。立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在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进程中,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做出新成绩,继续创造新精神。

(三)奋进时代征程,用好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蕴含的“传家宝”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

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在奋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着中华民族重精神的优秀传统,十分重视精神力量的传承和凝练。展望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经得起风浪、不懈怠精神,用好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体悟百年党史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历史是鉴往知来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治国理政最好的营养剂。在学习百年党史、掌握历史史实的过程中,要善于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标注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的系列精神坐标,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示的精神力量。革命炮火中的“敢”劲、建设浪潮中的“干”劲、改革天地间的“闯”劲、新时代征程上的“拼”劲,淋漓尽致、交相辉映,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精气神。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需要在不同精神形态所表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上做文章,把“敢”“干”“闯”“拼”的劲头接续在新时代的奋进征程上。

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汲取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精神力量。我们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同时,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风险考验更显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具尖锐性和严峻性。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汲取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过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经验结晶。连缀而成的精神坐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不同历史阶段困难挑战时的精神表征,是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也是接下来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精神钥匙。基于中国共产党精神(下转第46页)

党内法规建设的源头及历史影响

张海涛

一、党规：党内法规的概念前身

(一)毛泽东创造性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

党内法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之中。《毛选》收录了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其中关于“党的纪律”部分，他提到：“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正是因为《毛选》的权威性，所以在党内法规研究热潮兴起之初，学界普遍认为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最早是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而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最初版本使用的并非是党内法规，对应的表述实际是党规。其原文内容是：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并涉及到党规和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

历史的来看，从党规到党内法规的修改变化应当发生于建国初期《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过程中，并经由毛泽东本人修改完成。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录，毛泽东曾在1951年3月初来到石家庄集中精力编辑修改《毛泽东选集》，其中涉及党内法规的部分，经过了毛泽东反复的修改与校对。在4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曾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这说明，毛泽东亲自着手修改敲定了“党内法规”的概念表述。而且，协助毛泽东编辑《毛选》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负责选编、胡乔木负责语法修辞方面的修改和标点符号的校正、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都不涉及关键信息和重要内容的决定和修改，创造性观点均要出自毛泽东本人。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建国前的诸多版本中，也是沿用了党规的表述，尚未出现党内法规的概念。

(二)党内法规的概念前身是党规

从《毛泽东选集》修改前后的情况来看，党内法规的概念前身实际是党规，且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就已经提出，同时张闻天和刘少奇也在此次会议上使用了党规的表述。张闻天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在讲到“关于全党的团结”问题时，他指出团结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党规党法，遵守党纪”而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也代表党中央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他指出：“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与之相关，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

则与纪律的决定》三个重要的党规文件。

就目前学界的已有研究而言,对于党规作为党内法规的概念前身这一历史事实,已基本形成共识。一方面,权威教材《党内法规学》对此作出明确说明,这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意义;另一方面,党内法规研究学者注意到这一历史细节,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已不再将党内法规概念提出的历史节点推进至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但仍普遍认为是毛泽东率先提出党规概念和制度形态。比如,有学者指出:“党内法规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被提出是在1938年,但毛泽东所使用的是党规,而不是党内法规。”如果着眼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9月29日至11月6日),的确是毛泽东率先使用党规概念在前,张闻天强调党规党法的团结作用、刘少奇详细报告相关党规在后。但是,党规作为一种特殊且新兴的制度形态在党内如此重要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而且还同时由多位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党内领导同志对党规持认同态度或已达成一致认识,二是主要领导同志在会前已经商讨过而不是分别在会议上临时提出。这就需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党内法规的概念和制度前身,在创造性提出党规的过程中,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尚未获得党内法规研究学者的关注,相关问题也缺少应有的学理回应。

二、党规的创造性提出

(一)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而作准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了成熟。而在此之前,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自居,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出现了一系列不遵守纪律的行为,影响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党内的团结统一。同时,张国焘不仅在长征期间闹分裂,而且在1938年4月借机叛逃、公开叛党。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正是因

为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党的组织建设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与党中央领导制度的不健全存在直接关联。所以六届六中全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加强组织纪律建设,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工作规则和纪律建设,以此规范中央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并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刘少奇最早开始关注党的领导体制的建设问题。

而在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即1938年9月14—27日,召开了为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不仅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强调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这一意见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对此,毛泽东也曾说:“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二)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创设党规

刘少奇在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着重围绕党的团结问题作了发言。在1938年9月15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北方局工作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党在华北的工作。他在报告中围绕党的建设的问题,指出:“现在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进行党的建设。”在9月26日讨论六中全会议程时,刘少奇再次提出了党规的问题:“国际说,现在中共公开了,日寇企图进行破坏挑拨,工作的分散,容易发生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好,这值得我们很大的注意。同时要提高各级党部的团结。好在现在全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分歧的意见。如何团结呢?我想要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

是刘少奇在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党规的想法。而在9月27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也在发言中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建立党规的认同和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在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是刘少奇先提出党规制度形态,毛泽东后表示肯定和支持。但是,已无法进一步考证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否在政治局会议之前就已经交流了建立党规的想法,所以更为准确的,应当将党规的创设视为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重要共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推动的制度结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在会前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规定》等3个文件,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同时,刘少奇也实际负责起草了相关的中央党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由康生、刘少奇、陈绍禹负责起草《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三个重要的中央党规,以备提交六中全会来讨论通过。而这三个“决定”实际起到了对党章的重要补充作用。正如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指出的:“党章必须在党大会上修改,六中无此权,故只予以补充,七次大会再予党章以大的修改。现在的决定都是暂行的决定。”而从时间线索来看,9月26日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决定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并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最后一天11月6日由刘少奇作相关报告,从作出决定到法规生成的这一紧凑过程可以看出,党规制度形态的提出是一种临时动议,是针对特定的历史背景作出的直接反馈,刘少奇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报告了“党规党法”的问题

刘少奇在六中全会上详细介绍了创设党规和制定三部“决定”的缘由。他在11月6日作报告时,首先讲到了“为何要党规党法以及组织决定”,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党章内容制定较早,面对出现的许多新情况,需要在六中全会进行制度回应。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党,要通过党规党法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既需要政治上组织上这种柔性的团结统一,还需要制度上法规上这种刚性的团结统一。第三,党规党法的出台,本身也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通过这种暂行决定来补充党章的相关内容,是对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同时,刘少奇还详细介绍了三个“决定”的核心内容,最终由六中全会全体通过。也正是从这时起,刘少奇越来越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而他在党的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成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特色。

总体而言,刘少奇提出党规概念和主导推动三个“决定”的出台,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是因为党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带来的中央领导层工作规则和纪律的长期不健全;从直接原因来说,是针对王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以及张国焘分裂叛党行为。从党的历史来看,六中全会通过的三部中央党规,是建党以来对党的最高权力的一次规范,这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同时,这三部中央党规对后来相关制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尤其是为1941年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5年七大党章关于中央组织、奖励和处分等内容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

三、党规创设的历史影响

(一)为加强党内团结统一提供制度依据

在六届六中全会这个时间节点提出建立党规,其直接效果是加强了党内团结统一,巩

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发言中强调党规,是直接针对张国焘违反党纪的问题,而刘少奇、张闻天等也都围绕党规问题在会议上作出论述,旨在进一步要求党内其他同志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积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规定内容上,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例如,细化了中央领导层及其组成人员的纪律规矩,《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会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等等。再如,强化了各级党部工作的规则和纪律意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如有破坏纪律的情况,对其处分须报告上级党委批准;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执行民主集中制,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一系列规定的出台,有针对性的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

二是在制定过程中,让王明直接参与三部中央党规的制定过程,以起到对王明的提醒和纠正目的。虽然六届六中全会并未对王明的错误问题进行点名批评,但通过创设党规和制定具体的三部“决定”,却实质性起到纠正作用。尤其是让王明本人也具体参与到三部中央党规的制定过程中,实际上起到对他的直接约束。既可以让其意识到自己违反党纪行为的严重性,又可以在保证党内团结的前提下,促使其自觉遵守党规并积极改正错误,以起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二)约定俗成地使用“党规党法”的概念表述

历史的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党规党法”的概念在党内被经常提

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多倾向使用这一表述,这实际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效果。正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和在此之前的政治局会议上,都使用并支持了刘少奇所倡议的党规概念。刘少奇在1950年讲到:“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此外,陈毅、刘伯承、陈云等党内领导同志也都多次使用“党规”的概念表述。邓小平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也两次提及“党规党法”的问题。即使是在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仍然沿用了“党规党法”的表述,指出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践踏党规党法。

总的来看,党内对“党规党法”的表述使用,远不止上述所列情况,但仍能体现出“党规党法”的概念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习惯,满足了不同时期管党治党的制度需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规”“党规党法”等概念开始集中出现在党的文献之中。这既与党内同志接受新鲜事物的思维惯性有关,也与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党规党法的报告》的传达有关。这种约定俗成的制度效果,一方面强化了党内对于遵规守规的规矩意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规党法”概念的不断提倡,在全党会形成示范效应,可以自上而下的释放高度重视的信号;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的强化了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扩大党规的影响力,提升党规的实施效果。

(三)为党内法规建设奠定基础

党内法规的制度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之中,虽然在概念表述上存在话语变迁,但党规的提出仍然是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开端。如果将199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

视为党内法规规范化建设的重要节点,那么党内法规的立规自觉则应追溯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尽管建国以前的党规相关文件不太注重党规的发布名称是否规范、党规内容的体例结构是否合理、党言党语的使用是否准确,但并不妨碍党内对这一制度治党新形态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这一时期颁布了一系列关系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党内法规,为完善党的各项体制机制提供了制度依循。

党规是有其的基本特征的。

第一,党规是广义上的党的纪律。毛泽东不仅在“党的纪律”部分专门论述党规,而且还强调“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这表明党规在提出之际是被视为党纪的一种形态。尽管党内法规与党的纪律存在交叉关系,但整体上党内法规属于党组织和党员应当严格遵守的纪律,是一种成文形式的党纪。

第二,党规是详细的、专门的规章制度。毛泽东格外强调了党规的特殊之处,即“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这意味着党规内容要避免过于抽象、模糊,要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规定,使适用对象可以清晰认识党规的规定事项。

第三,党规的功能是统一各级领导机关之行动。党规在创设之初,就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所以毛泽东明确要求“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这表明党规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效力,权威性不容挑战。

而对比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三条对党内法规的定义,实际是对应了上述三项制度内涵。第三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其中,“体现党的统一意志”对应了“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和“专门规章制度”对应了“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对应了与党的纪律的联系。从制度内涵前后的对应性而言,1938年提出的党规与后来的党内法规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党规的提出实际上为当下党内法规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

四、结语

党规的制度创设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虽直接萌生于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加强党的自身的建设的组织需求,但仍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围绕管党治党的不懈探索,以及党内领导同志的智慧创造。客观而言,党规概念虽然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刘少奇提出,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 持,但在全党范围内公开提倡党规,仍然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首创。回顾党史,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于创设党规如此重要的党纪新形态,自然离不开其本人的支持和推动。而在1938年面对张国焘叛党、王明严重违反党纪,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自然要认真考虑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所以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尽管由刘少奇提出了党规建设构想,但仍然离不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摘自《理论视野》2021年第8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张海涛,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指南

黄群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指达到世界先进、前沿和发达水平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模式。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虽然对后发国家的道路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一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生搬硬套是不可行的,而首要考虑的应是自己的基本国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基本经济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经济现代化规律的认识,系统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指导原则、发展阶段、增长理论、战略路径、动力模式,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奠定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基础,是新时代指引中国经济发展、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其根本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围绕

根本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和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必须加强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如果说,经济现代化是达到世界经济先进水平的“趋同”过程,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要求,坚持党对经济现代化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求,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特色,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安全发展理念,从理念层面回答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发展路径、经济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系统的、贯穿新时代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紧密联系的集合体,需要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要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驱动经济现代化进程,探索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的经济现代化路径,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经济现代化目标。

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还必须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历史上因为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等而使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或者倒退的案例并不鲜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增强风险意识,既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防范“灰犀牛”事件,围绕粮食、能源、产业、金融、网络、生态等关键领域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用速度、结构和政策三方面的特点将经济发展阶段概括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进一步对我国经济现代化阶段性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从经济现代化进程看,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这种现代化阶段的重大变化需要经济战略和政策的重大调整,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基于对经济现代化阶段变化的进一步认识,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现代化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和主题要求,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不仅仅表明了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从工业化理论看,中国已经步入到工业化后期,新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这个新发展阶段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这实质上意味着新发展阶段是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在2025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二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突出特征和发展主题。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理论

一个国家要实现达到世界先进、前沿的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现代化,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题,也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经济增长本身可以包括经济活动的量的不断扩大,还包括经济活动的质的提升。经济增长的量的扩大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而经济增长的质的提升需要基于发展理念等来具体界定。大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量,经济增速及其影响因素是其核心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多年

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等新特征,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经济增长质量高低要用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来界定和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创新,表现为经济增长具有区域、产业、社会等方面的内在协调性,表现为绿色增长、人与自然和谐是经济增长的普遍形态,表现为全面开放、内外联动是经济增长的必由路径,表现为经济增长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充分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可以认为是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标体系。其中除了GDP增速外,还包括全员劳动生产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人均预期寿命、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森林覆盖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等多个指标。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阐释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可以说是质量优先的经济增长理论。质量优先的经济增长理

论是全新的理论创新,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更多是关注经济增长数量——GDP增速的传统,将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经济活动的质的提升上。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实现经济现代化,既需要发展理念指导,还需要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和内外环境变化进行科学的战略路径规划。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美丽中国等重大战略任务,以及深入推进实施新型工业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等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这些都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经济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尤其是将实体经济作为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实现供需动态平衡。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关键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8年,进一步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新要求,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政策要求。2020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要求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和供给侧有效畅通,与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和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效协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要求是经济增长源泉从要素投入的数量扩张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质量提升,这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主线,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以及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路径,对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市场以及产业、区域和企业各个层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提出了现代化的标准,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保障,从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城乡区域体系、分配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全面开放体系各个方面分别入手,协同推进,从而实现经济现代化。

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这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从低碳经济角度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实现机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突出特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项新的具有全局意义的经济现代化

战略和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经济现代化战略和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事关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国实现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作为经济现代化战略和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通过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创新来驱动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也体现了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求和本质特征,我国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沿着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的方向不断完善,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原则下,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加快形成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改革与管理有效协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战略路径,都是针对新时代发展阶段变化,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目标而展开的,内容具有内在一致性。尤其要指出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支撑。因此,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是需要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地系统地放在一起理解的。

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模式

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可以对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动力模式进行划分,从大的方面可以分

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类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可以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而前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同样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国家也会有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模式差异。经过艰苦努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成功探索出全新的经济现代化动力模式——通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经济增长、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创举。这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一个关键因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新时代,围绕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一是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围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断深化改革。四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在高起点上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充沛的动力。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本主义经济也始终没有处理好二者关系,成为经济危机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持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现代化的全新动力模式。

总之,从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从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到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路径,从经济现代化的增长理论到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模式,习近平经济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给出了全方位的理论指导。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方法论,要求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等,这也构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着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步入了新发展阶段,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实现经济现代化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摘自《经济日报》2021年10月21日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考

宋大伟

一、关于产业创新发展问题

“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于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完善产研合作、开源开放、自主可控、集成创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多学科、多技术、多领域跨界、交叉、融合、协同为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下大力气大幅提升科技创造力、科技支撑力、科技影响力,加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建设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一体化发展。

(一)创新发展智能制造

这已被主要工业化国家视为未来制造业的主导方向,对于提高制造业供给结构适应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分重要。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智能技术群可以提供高科学性、高经济性、高操作性、高可靠性的技术服务,“智能工厂”“智能物流”“智能网络”深刻改变着产业边界、制造方式、组织结构和模式,“数据+算力+算法”能够实现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生产、智能化运行,传统制造业将在智能机器人、智能化机床、智能传感器、智能仪器仪表、智能生产线、3D/4D打印等重点领域带动下不断创新发展,建立由智能机器人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人机交互的先进制造系统。

(二)创新发展绿色制造

这是资源节约、环境优化、生态良好的闭环生产系统和现代制造模式,可以更加清洁、

高效、安全地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绿色制造伴随绿色经济、绿色文明、绿色革命已经形成席卷全球的绿色浪潮。要牢固树立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把绿色技术广泛应用在企业发展计划、研发设计、物资采购、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和回收利用全流程,全面打造低碳产业链、静脉产业链和绿色供应链。这就需要大力推广应用绿色开发技术、清洁生产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循环利用技术、再生制造技术、净化治污技术等,在绿色制造和绿色产业发展中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在绿色增长和绿色生活方式中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三)创新发展服务制造

这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使传统制造企业的业务重心从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通过革新生产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推动技术驱动型创新与用户需求型创新相结合,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促进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生产性生产,实现“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在传统制造上、下游两端挖掘和释放“制造价值链+服务价值链”的增值潜力。这种增值潜力主要体现在基于产品设计优化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效能提升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交易便利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集成整合的增值服务,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

附加值和市场覆盖率。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必须坚持把创新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创立和拓展新业态、新市场、新消费、新动能。“十四五”时期,既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产业、信息网络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绿色低碳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还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产业、老年消费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旅游休闲产业、文化体育产业,加速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社会、现代化建设、可持续发展进程。

二、关于产业数字转型问题

(一)推进产品设计数字化

这样可以极大提升研制效率、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成本。通过应用虚拟设计技术、并行工程技术、资源重组技术、快速成型技术等,更好地将数据、知识、技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工艺、装备和服务,推动产品设计形态的虚拟化、网络化、界面化、平台化、服务化,从根本上发挥产品设计作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源头作用,实现个性化产品设计、差异化市场竞争、规模化定制生产,从而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谋转型,以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数字化设计在更深层次打造核心竞争优势的技术基础。

(二)推进生产流程数字化

应采用数控编程、模拟仿真、精确建模、实时决策等数字制造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建成自主学习、自感知、自适应、自控制的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和智能工厂,使各类制造装备具有互联互通的预测、感知、分析、诊断、控制功能,及时处置加工环境、加工对象、加工要求、加工过程、加工装备等随机变化因素,适应制造过程复杂性、多样化及工艺技术的实时性、可靠性要求。在生产流程数字化改造后,经过数字赋能的精益生产流程再造能够协同解决各类问题,从信息化系统到自动化系统构成全新的制造流程网络,全面提升企业生产质量、精度、效率、动能、安全水平。

(三)推进市场开发数字化

需坚持用户至上的战略取向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引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分析消费者和用户现实的、未来的、潜在的需求,统盘研究市场开拓、品牌打造、营销方略、推广策划;动态调控产品流、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合理运行,进而衍生出远程监控、远程诊断、远程运维等专业性服务,实时向用户提供研发—设计—制造—建置—维修的全面解决方案;最大限度扩展制造企业、市场与用户的协同程度和互动范围,实现供应链、产业链及企业间信息联通、无缝衔接和集约生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数字化环境下逐渐成为相互融合的价值共创者。

(四)推进经营决策数字化

要从多层级、多模态、多领域深刻理解经营决策数字转型价值,集成优化企业战略管理、资源管理、运行管理、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数据是体现价值和财富的战略资产,计算是产生、获取、分析、利用数据的重要工具,综合运用数据采集、机器学习、量化分析将会形成企业竞争新优势。“十四五”时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ERP(企业资源计划)、SCM(供应链管理系统)、MES(制造执行系统)等数字化管理方法,这就迫切需要提高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数据思维、数据分析、数据操纵、数据处理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转型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营造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生态环境势在必行。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经济规划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推广应用、数字资源开放保护、数字资产规范管理、数字产业集群发展,重塑现代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和创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

三、关于产业基础能力问题

产业基础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阻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迈向中高端的步伐。如新一代制造业核心软件是连接数字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的基石,被发达国家视为保证本国制造业“持续掌握全球产业布局主导权”的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已培育成长起一批国产制造业核心软件制造商,围绕创建高端价值链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并打破国外软件的市场垄断局面,但外资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信息管理、运维服务等高端软件领域仍占据市场和技术优势。又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必须改变部分元器件、零部件、高端仪器和主要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格局。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30%,进口金额3040亿美元;国内传感器市场规模达2188亿元,中高端传感器进口80%;仪器仪表行业进口528亿美元,90%的高端仪器来自国外公司;原油进口量超过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70.8%;铁矿石进口量突破10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87.3%。仅这5种进口产品就已严重制约我国基础工业、加工工业、装备工业和战略高技术产业发展。再如数控机床是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工作母机”。数控机床产业链上游包括主要原材料(如钢铁铸件)、主机制造(如基础件和配套件)、数控系统制造(如控制系统和驱动系统)和外围制造(如铸造、锻造、焊接、模具加工等)这四大类;数控机床产业链下游主要是汽车行业、机械行业、军工行业(如航空航天、造船、兵器、核工业等)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这四大应用行业。可见数控机床发展对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我国是全球高端数控机床第一消费大国,也是中低端数控机床第一生产大国;但德国、日本、美国在世界数控机床设计、制造和基础科研方面处在绝对领先地位,全球前10位数控机床制造商全部来自

这3个国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十四五”时期要抓好5件事:一要坚持不懈地把提高产业基础能力作为战略重点,坚定不移地把锻造长板、补齐短板、解决“卡脖子”问题作为战略目标;二要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分门别类制定和落实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三要突破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加大科研投入、风险投资、联合攻关、国产替代、标准制定、推广应用和国际合作力度;四要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技术成熟度、制造成熟度、产品成熟度、市场成熟度、产业成熟度,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引领重要产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五要推进“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世界制造业中心”走向“全球产业链枢纽”。

四、关于产业服务体系问题

(一)完善科技金融和技术转移服务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的市场制度安排包括风险投资、贷款支持、信用担保、科技债券、创业板市场等,非市场制度安排则是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设立园区等相应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主要有技术评估、技术交易、技术转让、技术代理、技术拍卖和技术集成等,实现由零散、线下的技术转移服务向平台化、市场化、互联网化的技术转移服务发展。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中心(STC)、英国技术集团(BTG)、以色列产业研发促进中心(MATI-MOP)的作法可资借鉴。

(二)完善信息技术和数据交易服务

云计算与大数据已成为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热点领域。要推动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即服务(SaaS)等云计算主要服务模式广泛应用,同时发展业务流程即服务(BPaaS)、存储即服务(STaaS)、安全即服务(SECaaS)、数据即服务(DaaS)、网络即服

务(NaaS),并向机器学习即服务(MLaaS)、人工智能即服务(AIaaS)等升级,统筹部署和开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有云、私有云、社区云和混合云市场。要健全由基础层、分析层、应用层构成的大数据生态圈,发展数据自营模式、数据租售模式、数据平台模式、数据仓库模式、数据众包模式,充分发挥大数据产业链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结构调整、资源共享中的作用。

(三)完善电子商务和权益保障服务

电子商务发展已由平台时代进入整体转型期,开放、共享、包容、协同的新理念正在塑造电子商务品牌化竞争的新模式,战略方向是营造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的综合平台。“十四五”时期,要发展在线内容付费电商、会员制电商、区块链电商、跨境电商、移动电商、社交电商、分享电商、众包电商、工业电商、物流电商、农村电商等,全面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加大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四)完善管理咨询和综合评价服务

“十四五”时期,必须把提高中小企业管理素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要深刻认识做好管理咨询和综合评价是企业的“软实力”和“硬任务”,坚持宏观监测和微观监测、外部诊断和自我诊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动态管理和静态管理相结合,科学、全面、综合咨询和评价企业的经营发展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投资收益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资本增值能力和社会责任能力,使中小企业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关于产业政策研究问题

近1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实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包括财税金融政策、科技创新政策、资本市场政策、产业基金政策、技术转移政策、装备技术政策、产权保护政策、人力资源政策、政府

采购政策等。“十四五”时期,保持这些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应该看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并行发展阶段,不断迈向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发展现代化。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超大体量的制造能力、超大预期的增长动力,需要深入研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质态、量态、时间、空间分布和演进规律,统筹实施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产业政策。

(一)注重研究实施产业布局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产业门类、产业要素、产业分工、产业链环的地域分布与区位优势,认真了解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层次与关联效应;实事求是确定产业发展定位与目标、发展方向与重点、发展路径与举措,优化区域布局、优化空间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投入产出;特别是要防止结构趋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生态破坏问题。

(二)注重研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

要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有效改变有些地方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失衡、市场结构失衡、增长结构失衡现象,有序渡过结构调整阵痛期、进入产业经济转型期、走向创新驱动发展期。要比较研究国内外产业结构、科研结构、企业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产品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变化和发展趋势,围绕战略目标、研发设计、制造工艺、管理技术、集成创新、增长动能、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对标和达标。

(三)注重研究实施规模经济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坚定走好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新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要科学合理制定产业总量目标、产业增长目标、产业结构目标、产业质量目标和产业调整

目标,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产业园区、产业基地、产业集群,立足发展数字经济激活存量经济、消费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乡村经济、小微经济。

(四)注重研究实施建设时序政策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时序安排要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投资和负债、局部和全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把握本地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现有结构、需求强度、财力状况,既要瞻前顾后、统筹安排,又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防止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过度负债。要始终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深入践行经济周期规律、产业顺序规律、技术进步规律、优先发展规律、宏观调控规律,既要抓住机遇、防范风险,又要迎头赶上、跨越发展,切实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六、关于产业国际竞争问题

(一)提升货物贸易档次

我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已是世界第一大国,作为30多个国家的最大出口国和60多个国家的最大进口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进一步形成货物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着力打造以技术、质量、标准、品牌、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力,着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带来的挑战,着力防范境外投资、期货交易、上市融资、汇率变动、国际结算风险,着力健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置机制。

(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我国服务贸易“十三五”以来平均增速高于全球并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2位。我国发展服务经济、拓宽服务消费、扩大服务出口带来了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服务出口持续增长标志着我国服务贸易进入黄金发展期。要继续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壮大服务贸易领军企业,发展服务贸易新型平台,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做大、做

强、做优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信息技术服务贸易、金融服务贸易等。

(三)推动知识产权贸易发展

知识产权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三大支柱,而专利使用费和技术交易费是衡量知识产权贸易的2项主要指标。美国、欧盟、日本的专利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出口额占全球80%以上,我国“两费”出口额全球占比很小但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围绕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布局技术创新链、产业升级链、贸易供应链,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健全防止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和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逐步缩小专利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进出口贸易逆差并迈向知识产权强国。

(四)抢抓数字贸易机遇

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全球加快进入数字贸易时代,但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未来影响程度难以预测。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步入高速增长、总体向好轨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又面临“双循环”发展中的新契机。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数字贸易战略,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出现许多新动向。我们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研究数字贸易测度问题、标准问题、产权问题、安全问题、利益问题、公共问题、技术问题和商业问题,并同国际社会一道及早谋划迎接数字贸易引领全球新经济浪潮的因应之策,在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全球标准制定中提升中国话语权。

(摘自《新华文摘》2021年第15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宋大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

陆益龙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的脱贫攻坚完成了历史性任务。2020年如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发展迈入新时代,迎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乡村发展将向何方?将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宏观战略设定的目标?乡村发展问题是农村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对发现、认识乡村发展规律,指导乡村振兴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已有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调查经验基础上,结合制度分析的视角,探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发展较为理想且有效的路径选择问题。

一、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的脱贫攻坚战略目标,2020年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2020年之后,乡村发展进入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之所以说中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主要是基于四个层面的社会事实而作出的概括与判断: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二是宏观制度安排的结果;三是乡村发展的社会现实;四是精准扶贫的微观实践。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834元。总体来看,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意味着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虽然经济收入的城乡差别依然较大,但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得以明显提高,且提升速度较快。

在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经济发展向好、向稳的大势为巩固脱贫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当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也成为大势所趋。即便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这些问题不会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趋势。因此,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和发展理念的更新,乡村发展已开启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中国乡村发展新格局的出现也是由国家宏观制度安排带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农村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稳步、扎实地推进。1986年,国家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地方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扶贫主管部门,负责领导和开展本地扶贫开发事业。1994年,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主要瞄准区域性贫困,重点开展贫困县的扶贫开发工作。到2000年底,农村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3000万,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4.3%降到3%。可见,扶贫攻坚计划在农村减贫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颁布,为新世纪农村减贫工作进行了宏观规划和制度安排,确立了综合性开发式扶贫的主导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提出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要求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实现全部脱贫目标,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贫困治理机制,并形成了广泛动员、各方参与的精准扶贫行动体系。

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看,国家宏观制度“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反贫困的“中国奇迹”的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既是国家政策向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是国家制度安排与实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发展新时代的到来,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的结果。

中国乡村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从社会转型论的角度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结构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在此进程中,乡村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大转型。转型之后的乡村已从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迈向“后乡土社会”。当今乡村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不是“乡土社会”的“饥饿问题”,或者说,绝对贫困问题不是乡村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了,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则成为乡村发展的新目标。

从乡村脱贫经验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户主要通过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的提高,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发挥多种经营的效益优势,快速摆脱了温饱问题的困扰。随着市场转型的全面推进,广大农户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之中,通过“闯市场”机制从市场中分享到更多机会。农民工向城镇流动,不仅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而且给乡村社会发展开创了新局

面。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他们的增收渠道扩展了,不再局限于农业,而是可以通过劳动力的外出经营,在“大市场”中寻找增收机会。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来看,目前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为3200元左右。如按此标准来推算,一般农户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基本上就能保障该农户在现行贫困线上脱贫。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走出绝对贫困已成为现实,乡村发展迎来新任务。

经过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和实施,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整体性解决。2021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状态,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取得彪炳史册的成就。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部署,在此宏观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面临新格局

乡村振兴新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乡村发展的形势与格局已发生变化。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乡村社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无论从发展目标与任务,还是从发展条件的角度看,乡村发展皆已发生重大转变。

首先,从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来看,乡村振兴新时代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随着乡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目标不再是解决贫困问题,全面脱贫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已成为发展的新起点。在新时代,乡村发展总体上不再是以解决温饱问题或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为主要目标,而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

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单一路径。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现代化、城

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环境,并不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是面临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谋求更为理想的发展。

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也不同于依附理论所概括的边缘地区“依附性发展”。尽管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差别依然存在,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较为明显,但是,伴随着发展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价值、乡村主体性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乡村并非依附于中心而取得发展。

作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根本宗旨在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实现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可选择的路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并非只有现代取代传统、城市取代乡村的现代化单一模式。新型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意义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过上美好的生活,在通过何种方法改善生活等方面,则有多种可能性、多种选择,因为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确立标准化、单一化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那么,乡村社会现代化不仅会偏离中国实际,而且还可能付出牺牲社会与文化多样性的代价。

驱动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依靠资本的积累和扩散,而是需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农村改革和农村扶贫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富民之路。因而在新时代,乡村居民在国家制度的支持下,也会充分发挥出发展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目标。

其次,从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来看,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显然已发生转变。在乡村实现整体性脱贫后,乡村发展中的扶贫与反贫困其实并未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变。这一

转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从脱贫攻坚向巩固脱贫成果的转变;二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从应对性扶贫转向预防性治理;三是乡村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从扶贫脱贫机制向均衡发展机制的转变。

进入新时代,虽然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不再发生。脱贫攻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而是需要不断巩固成果,提高乡村社会反贫困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通过国家扶贫攻坚政策而摆脱贫困的乡村地区来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乡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得以全部摘帽脱贫,这一发展成果是在强有力的脱贫攻坚行动支持下取得的。脆弱性地区和弱势群体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为防止脱贫人口返贫以及乡村贫困再发生,反贫困工作仍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只不过新时代反贫困工作重点和中心有所转移,亦即转向有效巩固已有的脱贫成果,并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一方面需要保障已有精准扶贫措施以新的形式持续跟进,避免因帮扶措施中断而导致脱贫的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乡村发展要加强原先深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社会支持需重点放在“造血式”帮扶上,注重恢复并提升弱势群体自身的“造血功能”或发展能力。

乡村在未全面脱贫之前,扶贫开发工作属于应对性扶贫,扶贫工作需要对贫困问题,要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深度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态、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乡村贫困问题的整体性解决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和实践密不可分,如果全部撤离帮扶措施,一些问题可能会复发。因此,有效巩固脱贫成果,必须采取预防性治理措施,通过扶持和促进发展有效防范贫困问题的产生。

预防性治理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反贫困机制,其功能在于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种形式贫困问题在较大范围内发生。与脱贫攻坚不同,预防性治理是人类社会反贫困或贫困治理的一种策略,主要是为了预防和应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连片贫困与个体贫困成为范围较广的社会问题,对各种贫困问题加以及时有效解决。乡村预防性治理是新时代的反贫困工作主体方式和任务,也是精准扶贫战略的转变和更新。在预防性治理工作中,一方面维持和保证脱贫攻坚阶段的各项扶贫脱贫政策措施的一定连续性,对脱贫摘帽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仍保持相关扶持政策的施行,以保证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能够持续发挥预防和支持功能,避免帮扶政策措施退出后,贫困问题在较大范围反复和再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仍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关键帮扶政策和措施的延续与跟进,对精准扶贫阶段的一些强化措施须经科学评估后逐步谨慎退出。另一方面,要推进原有扶贫开发工作职能转变,将工作重点转向支持发展与防止返贫之上。为有效预防脱贫摘帽地区与脱贫人口的返贫,可通过“设立脱贫攻坚过渡期”,维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通过建立预防性的监测和应对机制,针对脆弱性较大的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提前采取积极有效的帮扶措施,防止贫困问题再发生。

在实现整体脱贫之后,乡村发展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面对乡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采取积极的均衡发展措施,增强乡村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内生发展动能,降低脱贫地区和人口返贫风险以及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风险,逐步缩小区域和地区间发展差距。

进入新时代,乡村发展条件已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乡村发展迎来新起点、新格局和新条件。新起点就是乡

村社会实现整体性脱贫,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儿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站在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新起点,乡村社会需要向另一个更高目标迈进。

新格局是指乡村发展所处的大环境、大背景和大趋势。乡村发展路径的选择必须根据大环境而作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环境虽然总体上没有大的改变,仍是费孝通所总结概括的“信息社会”,即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跳”。但是,信息技术的更新和升级,特别是5G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高度互联互通的信息社会,乡村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有新的机遇。一方面,信息社会的需求变化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人才结构、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技术进步与更新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新时代乡村发展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推进的,在精准扶贫目标达成之后,“三农”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振兴。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乡村社会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建设、基层治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迎来了新的发展格局。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趋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对于乡村发展来说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关系,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意义上人口进城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则是人、产业及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有着多元的模式,所确立的城乡关系是融合发展的关系,亦即城乡居民、城乡产业和城乡生活方式的融合发展。

进入新时代,乡村发展具有了新的条件。长期以来,“三农”工作实践已积累了丰富且行之有效的经验与机制,这些经验与机制主要包括在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阶段形成的城

乡联动、东西部联动的发展机制。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东部支援西部、城市与乡村相互促进的协调联动机制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有的经验和机制为新时代的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对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新时代的乡村需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起新发展格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发展既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同时又要朝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上,路径选择对于发展目标实现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三、“补短板”与乡村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之路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科学合理、正确地选择乡村发展路径尤为重要。为实现乡村发展新目标,发展路径的合理性与恰当性不仅可确保振兴实践方向的正确,而且有助于提升乡村发展的效率。

合理地选择乡村发展路径,必须科学、准确把握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充分地认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当前,乡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虽已全部脱贫,但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又必须面对乡村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补上乡村发展的“短板”。按照“短板效应”原理,如果不能补齐乡村发展中的“短板”,就难以达到发展的平衡,难以实现充分发展。面对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首先要找出制约乡村发展的“短板”。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制约乡村发展水平主要有三大“短板”: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乡村教育。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短板”。尽管从纵向比较的角度看,经过新农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的努力,当

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已经得到明显地改善。然而,相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重点加强。

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要根据乡村振兴与乡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可能需要重点在水基础设施布局、5G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超前布局、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社会设施现代化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补齐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短板”。

对于那些刚摆脱绝对贫困的乡村地区来说,产业发展的滞后性与不充分问题是一块较为明显的“短板”。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不仅关系到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巩固和可持续,而且关涉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建设。在脱贫攻坚政策有力支持下实现脱贫的乡村,面临较为共性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即依赖于农业。在这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目前,尽管农业绿色水平、农业创新水平和农业共享水平对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业协调水平和农业开放水平发展滞后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因此,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实现新时代发展滞后地区的乡村产业兴旺,就需要从结构、协调和开放三个重要突破口发力。

首先,在结构方面,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短板”的主要方式是解决农业依赖以及农业结构单一问题。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显然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难以满足农民增收的功能需要。农业内部也存在着结构单一和结构刚性的“短板”,亦即一定区域内农业通常依赖于种植业,且种植结构较为单一,随市场需求变化而改变的弹性较小。

补齐乡村产业结构的“短板”不仅要改变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且还需要从供给侧结

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突破,通过改革创新的推动力,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与此同时,需要按照市场机制的原则,调整农业内部的结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次,在协调方面,乡村产业发展的补齐“短板”需要重点围绕城乡统筹、产业融合的中心问题,为提升农业的协调水平开辟多种有效路径。乡村产业要实现均衡、充分的发展,就必须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的瓶颈。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需要建立起一体化的、相互融合的体制机制,消除二元壁垒,提升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水平与配置效率,以使乡村资源、乡村价值、乡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机制也能利用现代城市发展的拉动作用和传导效应,迅速带动乡村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发展。

在市场化、现代化转型的大环境下,农业发展显现出协调方面的问题,亦即农业适应现代市场社会需求的能力与机制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农村,农业缺乏高附加值的内涵,经济效益较为低下。农民依靠农业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受到较大限制。因此,补齐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还要提升农业与市场的协调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以及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此外,在乡村生产要素的开放方面,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主要表现为土地、资金和技术的开放度有限。自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市场向农村劳动力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大量农民工可以流向城镇务工和经营,从而大大增加了乡村居民在农业外获得收入的机会。但受体制机制的影响,乡村对外的开放程度较为有限。农村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技术下乡”等面临较多障碍和阻力,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发展。较低的开放程度实际上也限制了乡村新产业、新

业态的发展,同时会约束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更新与增强。补“短板”、扩大乡村开放,关键在深化改革。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仍须不断推进创新实践,在乡村市场体制机制方面深化改革,提升开放水平,让更多的新要素能够畅通地进入乡村社会,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影响乡村均衡发展的又一块“短板”是乡村教育问题,这块“短板”常被遮蔽,或未受到足够重视。当前,乡村教育的“短板”问题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二是乡村教育机会的不平衡;三是教育与乡村发展的相背离。在乡村人口大流动背景下,乡村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另一方面又出现教育资源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农村生源流向城市,乡村学校面临生少师多的不均衡格局。机会均等也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受体制及资源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实际上存在着不平衡问题。此外,在乡村转型与发展进程中,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不仅越来越脱离乡村社会实际,而且越来越背离乡村社会发展需要。费孝通曾关注到并反思了20世纪40年代“侵蚀冲洗下的乡土”问题,当时的教育不但没能胜任现代化的任务,反而让乡村的孩子再回不了乡村,从而产生“侵蚀了乡土社会”的副作用。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有着长远的、结构性的意义,没有乡村居民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将缺乏人力资源的基础。“补短板”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乡村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加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乡村发展的“主旋律”已发生历史性转变,因而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调整。中国乡村幅员辽阔,区域

差异性大,在发展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多样性原则,即各地乡村要根据各自自然、历史及社会文化的特点,选择多种多样、适当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然而,在路径选择的大方向上,则需要根据乡村发展的大势加以准确地把握。

从中国基本国情及乡村实际情况来看,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需要坚持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

首先,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战略重点,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这一重要战略,并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目标,推进新时代的乡村发展。作为宏观制度安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大方向。

乡村振兴不仅是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也是新时代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的振兴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只有乡村社会得以振兴,才能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发展成就,才能保障乡村社会持续发展,城市与乡村才会和谐共存。因此,乡村振兴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乡村的发展,而且对于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多样性以及系统的协调运行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

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合理且有效的选择。在农村实现全面脱贫之后,一方面乡村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振兴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乡村也更需要进一步推进振兴措施。为满足广大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社会需要在产业发展、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实施振兴政策,以实现城乡、区域之间均衡发展,提升乡村社会的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是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充分

发挥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体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乡村主体认识到振兴乡村的价值,并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之中,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目标仅仅依靠乡村内部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与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相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需要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力量的不断进入与增强。在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城镇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发展处于弱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政府推行和实施具有扶持性、保护性和建设性的政策措施,为新发展格局下乡村发展注入和补充新的动力。此外,振兴乡村还需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功能。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扩大乡村开放程度,让市场的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还要与新型城镇化有机融合起来,共同推动乡村新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行不悖。新型城镇化体现出乡村和城镇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如李强等提出的“就地城镇化”,还有乡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以及乡村集镇中心化、中心村、村庄新型社区化等路径。

乡村不完全等同于农村,乡村社会既包含农村的村落,也包括小城镇的县城、乡镇等社会构成。因此,乡村振兴包括小城镇的发展与振兴。在新时代,小城镇仍是费孝通所说的“大问题”。因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可以发挥小城镇发展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推进农业结构转型升级、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发展小城镇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一些特困地区农村的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在小城镇新型社区。这样,小城镇发展实际上又面临新的任务,亦即把反贫困或贫困治理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加大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力度,拉动了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跨越式发展。

某种意义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耦合点就在于大力发展小城镇之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县城、乡镇和集镇的兴起与繁荣,不仅会丰富城镇化的内容、提升城镇化水平,也会对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新型城镇化战略既要谋划大中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更要注重小城镇的发展。无论从城乡体制变迁的角度看,还是从苏南等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发展历史经验来看,小城镇发展既是破解“三农”问题困局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总之,有效地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起来,形成驱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实现乡村发展动能及驱动方式的更新,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五、结语

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总有时代特征,留下时代烙印。把握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就要紧扣时代主题,前瞻时代大势。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新中国乡村发展大体经历这样几个时代:一是新中国初期的小农经济时代;二是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化时代;三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开放时代;四是税费改革后的新农村建设时代。2020年农村全部脱贫之后,乡村发展进入乡村振兴新时代。迈入乡村振兴新时代,既是“三农”政策与国家制度安排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之一,也意味着乡村发展面临新课题、新机遇。正是在国家一系列强有力的惠农支农政策和精准扶贫措施的作用下,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乡村发展面临新任务。乡村社会是社会系统的主体构成之一,乡村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发展和协调运行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乡村发展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是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乡村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城镇化与乡村

协同发展的前提下,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达到和谐均衡的格局。

乡村社会如何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如何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如何转变农村反贫困机制和策略,支持农村脆弱地区的均衡和充分发展;如何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这些都是新时代乡村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路径选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对于乡村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探讨新时代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寻找一条理想化的、最优或最有效的具体路径,而是要正确把握乡村发展的大方向,明确乡村发展需要践行的合理原则及有效策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中,乡村发展需要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进。尽管社会现代化是大趋势,但在推进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合理、有效的路径选择须根据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亦即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对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乡村社会来说,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既面临“补短板”问题,也面临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问题。对于存在较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乡村社会而言,路径选择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中摸索出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新路径。当然,乡村发展在路径选择上也要把握发展的大方向:那就是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之路,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4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蔡 昉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 21 世纪的全球大趋势。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20 年,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为 25.9%,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为 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 5.7%,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作为一个处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国家,中国在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三个特点:其一,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其二,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其三,未富先老的独特表现。

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高度关注人口老龄化,这是因为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状况与趋势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要么是正面的,要么是负面的。经济学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尝试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予以理论化。下面,我们根据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与本文讨论的问题具有紧密相关性这两个原则,简述三个重要的人口—经济关系理论,这些理论分别揭示在相继发生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与之重叠的人口转变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制约。

贫困陷阱理论描述的是一种人口增长过度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不发达状况。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人口与发展关系的学者,马尔萨斯假设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生产仅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最终只能依靠饥馑、战争、疾病或政策干预等方式

抑制人口增长。基于这一马尔萨斯传统,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不发达状况看作一种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在人口增长超过其他生产要素增长的情况下,生产率、产出和收入都十分低下,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足以保障全部人口在最低生存水平以上的生计,也不足以支撑简单再生产必要水平的储蓄。因此,这种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导致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状况。

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即产生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增长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这对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因而形成更高的 GDP 潜在增长率。作为这一理论的一种补充,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把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一种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劳动年龄人口更快增长的结果,并且这一特征很好地刻画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因此,这两种理论假说在解释后起国家的赶超潜力时具有相互补充的意义。

长期停滞理论指出,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凯恩斯虽然承认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度增长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但他同时警告,停滞的人口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灾难性

后果。遵循相同的思想脉络,汉森最早使用“长期停滞”这个用语表述停滞的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萨默斯指出,至少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就陷入长期停滞,表现为低长期利率、低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

长期停滞既是供给侧现象也是需求侧现象。虽然萨默斯把长期停滞归咎为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需求不足问题,但是,他和合作者概括的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渠道,实际上指出了长期停滞问题的原因,从本源上就是供给侧问题。根据理论预期和现实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个事实。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这些因素共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第二,总人口的减少降低投资意愿和消费倾向,导致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造成的供给侧冲击主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不可逆转地下降,总人口减少造成的需求侧冲击很可能会造成经常出现增长缺口,即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能力的情形。

在过去40余年经历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先后跨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目前正在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经济增长减速的供给侧挑战。由于总人口预计在不久后达到峰值,中国必须做好应对需求侧冲击的准备。本文将从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开始,进而考察这两个转折点如何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后讨论政策含义并提出改革建议。

二、中国的老龄化: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

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原因。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经历迅速和大幅度下降之后,自1992年以来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1)的数据,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的预期

寿命为77.4岁,60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为21.1岁,都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除了遵循一般路径之外,中国的老龄化过程还有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中国的老龄化进程都是最快的。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205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这个比重的世界平均提高速度为1.5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

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预计将从2020年的18.1%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同期中国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仅仅从23.4%降低到22.6%,使得中国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最后,中国的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排位远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0262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5%,但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7.5%,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中国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届时,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预计达到中位预测的21730美元或高位预测的22999美元,均大幅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4540美元)。

人口老龄化过程并非波澜不惊,而是按照必然性先后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次都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2010年发生,以15—59岁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该组人口总量在

2010—2020 年间减少 2349 万。根据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的第二个转折点预计在 2020—2030 年间发生,以总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图 1 展示了中国人口两个转折点的到达年份。从中可见,联合国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9 年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峰值的预测有差别,其中 2019 年的预测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过于乐观,预测的人口峰值时间延迟到 2030 年。然而,如果把联合国的预测数与中国人口迄今为止的实际数相比,我们或许应该立足于一个更早到来的人口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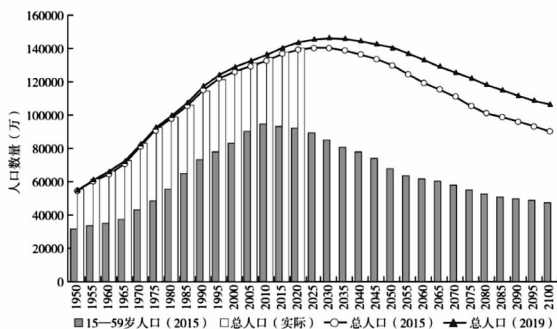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人口预测的几种情景

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转折点期间,即 2010 年到 2025—2030 年期间,中国同时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期间,不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增长也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正如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建议的那样,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

三、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把伴随着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出现的人口特征变化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我们曾经估算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潜在增长率,估计结果可以十分贴切地叙述人口红利从出现到消失、经济增长从加速到减速的全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阐释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如何通过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变化,从供

给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总的结论是,正如老龄化本身不可逆转一样,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也终将一去不复返,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供给侧冲击,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挑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便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具有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因而主要由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很快。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传统产业比较优势弱化,无论是从理论预期,还是从国际教训,以及中国的现实,我们都应该对造成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的两种现象有所警惕。

第一是部门内的资源配置僵化现象。传统比较优势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必须通过改善生产率保持竞争力。但是,最终的结果需要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决定。这时,许多竞争力不够的企业便以稳定就业为借口寻求政府保护,还有一些企业也努力获得产业政策的支持,期冀可以免于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其结果便是大量低效率企业得以生存,甚至滋生数量和规模皆可观的“僵尸企业”,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被压低。

第二是部门间的资源配置“逆库兹涅茨化”(库兹涅茨指出,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结构变化,遵循的是生产率提高原则。因此,与这个原则相背离的资源配置,可以被称为“逆库兹涅茨化”)。比较优势下降对于部门来说,意味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萎缩。具体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产生制造业竞争力被削弱的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32.5% 下降到 2018 年的 29.4%。制造业增长的相对滞后则意味着生产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该部门向服务业的转移。由于中国的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生产率不仅远高于农业,也显著高于服务业,因此,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是违背生产率提高原则的。

在转向关于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将如何从需求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关系。把估计的潜在增长率与同一期间的实际增长率进行比较,并观察两者差异导致的产出缺口(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减得出的百分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口转折点如何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的认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实际增长率总体上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把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进行逐年比较的话(参见图2,其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的百分点之和即为实际GDP增长率),可以发现,2010年之前的产出缺口,无论是正缺口还是负缺口,均显著大于2011年之后情形。由此可以观察到两个现象。其一,2010年之前较大的产出缺口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大波动的结果。其二,经济增长减速后并没有发生显著的需求侧冲击现象。不过,随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临近和到来,后一种情况即将发生变化。虽然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也会造成供给侧冲击,即像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一样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一次冲击将更突出地表现在需求侧。正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需求因素将经历长期的弱化趋势,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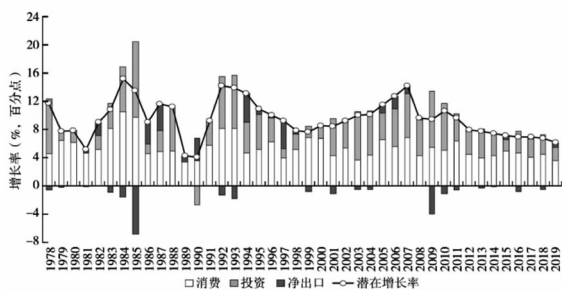


图2 潜在增长率及需求因素对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中国尚未到达其人口峰值,前述潜在风险终究只是一种假设的情景。不过,除了理论上符合逻辑的论证之外,人口因素对需求的“三驾马车”,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影响已经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观察。正如图2所示,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与表现为各需求因素贡献率加总的实际增长率严格吻合,就意味着需求因素的预期下降已经实际发生。

人口因素对供给侧增长潜力的影响,也会转化为对需求侧的冲击。首先,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会加速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人口相对年轻的国家转移,并相应降低出口增长率。最后,整体经济从而就业和财产收入的增长减速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除此之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的人口增长趋缓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可能会以三种效应减少消费数量、降低消费倾向。第一是人口规模效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更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消费增长减速,而人口规模的负增长也就等同于消费者数量的减少。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老年人消费较少以及就业人群缴纳社保负担重,将从宏观层面降低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被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却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并且还常常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必然加剧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趋势。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国家在经过老龄化过程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传统比

较优势弱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中国已经跨过了这个转折点,也经历了潜在增长率以及实际增长率的持续下行。接下来,一个国家终究要经过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负增长将产生削弱各种需求因素的效果,可能造成总需求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实现其潜力的情形,形成经常性的负产出缺口。中国尚未到达这个转折点,但是,已经经历过两个转折点的国家如日本,可以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其第一个人口转折点。面对供给侧冲击,日本经济未能良好应对,其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甚至是负的。日本于2009年到达人口峰值并于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同步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当年的GDP增长率为-5.4%。而且,在日本经济减速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潜在增长率逐年降低,实际增长率也经常不能达到增长潜力,出现负产出缺口成为常态。

四、政策含义和政策建议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规律性现象,因此,老龄化过程无法阻止。在中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政策生育率(即针对不同人群政策允许生育孩子的总和生育率)是1.5,而那时的实际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5以下。这既说明生育率下降有着比生育政策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驱动力,也足以使我们预见,生育政策调整不太可能对生育率提高和人口增长产生实质性的促进效果。例如,2014年出台的“单独二胎”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4.9‰提高到5.2‰;2016年出台的“全面二胎”政策,仅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5.0‰提高到5.9‰。随后都再次进入迅速下降的轨道,2019年下降到3.3‰,系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毋庸置疑,取消对中国家庭生育孩子数的政策限制,既符合人民意愿也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取向。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有什么万应灵药,能够实质性地提高生育率和延缓人口老龄化。因此,以下我们主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结合供给侧和需求侧及其相互促进关系,提出如何在老龄化条件下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在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模式不再能够支撑合理增长速度的条件下,亟待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潜在增长率。为了阻止妨碍生产率提高的部门内资源配置僵化,需要从改革出发,在实施产业政策中强化竞争性原则,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打破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消除行业进入的体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企业退出机制。避免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逆库兹涅茨化妨碍生产率提高,出路同样是改革。为了赢得时间以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在诸如户籍制度这样的领域推进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增加劳动力供给和促进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稳定传统增长动能,尽可能使新的生产率提高效果抵偿甚至超过生产率下降的因素。

在需求侧,关键是挖掘居民消费的潜力,稳定和扩大需求因素,以保障潜在增长率的实现。虽然需求因素包括净出口、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三个方面,但是,在世界经济处于长期停滞、逆全球化趋势上升、技术和供应链脱钩等环境下,外需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样强劲;投资需求的潜力是存在的,但是总体上将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而趋弱。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明显的提高潜力。

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入手。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

基础,但是,两者之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同步,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这个同步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均等的收入分配格局,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城乡之间和收入主体之间的差距。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缩小到比较合理的水平,譬如基尼系数在0.4以下,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固然,更具累进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是符合规律并且效果立竿见影的再分配手段,然而,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紧迫问题,应该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着手。

社会保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基本养老保险更具有针对性和紧迫性。目前中国人有9.7亿得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其中55.0%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

是农村居民和城镇没有工作者或农民工。其他的45.0%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其中也分为两种类型:大约87.2%为企业职工,其余部分系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不同类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待遇上的差别,特别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具有自愿参加、低缴费率和各级政府补贴的特点,因此,从这个模式入手提高养老保险的普惠性,是在扩大覆盖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可选路径。

(摘自《新华文摘》2021年第16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接第15页)谱系所蕴含的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接下来的风险挑战时会更加从容沉稳,更具底气自信。

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挖掘持续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精神动力。新时代的长征路同红军长征虽然时空境遇有着显著差异,但是在开创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方面存有异曲同工之处,依然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依然有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一切骄傲自满、不愿接续开拓创新的想法,都不能成就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自然也就无益于新时代长征路的践履。以长征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也必然在新征程上融合新的时代内涵,继续指导着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无论我们走的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为了出色完成时代答卷,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滋养,在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中,构筑起一座座精神丰碑,绘就了独特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境遇,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重大困难、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考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用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续写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新篇章,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王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 基于英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与启示

任继球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临着传统成本优势锐减,产业对外转移加大和技术引进难度倍增等新问题,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大国制造业长期发展趋势和挑战,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和美国曾先后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后,英国和美国制造业先后出现了一些相同的发展趋势和挑战。英国制造业规模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100多年才被超越,且现在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应对这些趋势和挑战的经验做法,对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提供重要镜鉴参考。

一、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工厂:英美制造业在全球地位的演变

英国制造业产量在19世纪中叶登顶世界第一,在19世纪最后10年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1850年左右,生产了世界50%的铁、5/7的钢和40%的金属器件;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接近20%,居全球首位。但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等

国家传播,英国制造业优势不断下降。19世纪末,英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被超越,此后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不断萎缩。1890年初,英国的优势产业也在衰落,在钢铁这一工业化关键商品的生产中,美国和德国双双超过英国。190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萎缩至18.5%,低于美国的23.6%。1913年,英国制造业份额继续下降至13.6%,远低于美国的32%。

美国制造业产量在19世纪末最后10年登顶世界第一,尽管21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有所下降,但至今仍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美国内战前的1860年,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仅为7.2%。内战结束后,在其国内市场需求的拉动下,美国制造业快速发展。1880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上升至15%左右,低于英国的22.9%。1890年左右,美国制造业规模超越英国,成为全世界第一。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达到巅峰。20世纪50年代,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接近40%,但此后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滑趋势显现,1980年,美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下降到20.06%。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两者差距不断缩小。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进入“失去的十年”,被美国重新拉开差距。此后,美国传统制造业在全

球化过程中不断衰减,其低技术制造业和产业中低端环节转移或外包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从制造业增加值来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下降,2010年被中国超越(见图1)。但至今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仍领先于其他国家,在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美国依然控制着全球产业链。例如,2019年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前10家企业有5家美国企业,占前10家企业营收比重超过50%,仅该5家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30%,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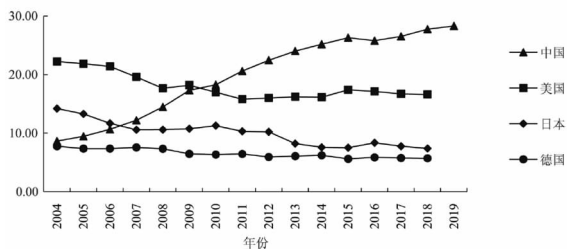


图1 2004年以来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世界工厂的共同烦恼:英美制造业面临的相同趋势与挑战

(一)从贸易保护向推动自由贸易转变,贸易逆差压力加大

19世纪20年代,英国仍然对工业品保持非常高的关税。但随着英国制造业竞争力跃居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制造业厂商为换取国外市场开放和扩大世界商品市场,对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英国开始逐步取消本国的贸易保护,对外开放步伐加快。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1849年完全取消《航海条例》。1848年,英国有1146种应纳关税商品,但到1860年已经下降到只有48种。1875年,英国对制造品进口的关税已经下调为零。英国一直沿用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为美国等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外贸易逆差快速扩大。从1850年到19世纪末,即英国制造业从登顶世界第一到世界第一位置被超越期间,英国对美国、德国和法

国的贸易逆差逐渐上升。

美国在后发追赶时期,一直实施着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内战后,其关税大幅上扬。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美国贸易从逆差转向顺差,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在经济大萧条后,即1934年之后,为削减其他国家对美国进口壁垒,促进美国出口产品打开市场,美国通过一系列贸易谈判,不断削减对外国产品的关税,以换取外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同等待遇。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在20世纪40年代大幅下降,50年代早期在10%左右企稳,70年代后期再降至约5%,迄今一直维持在该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进口量开始上涨,而出口量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贸易逆差压力加大。1971年,美国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货物贸易逆差,此后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9年扩大至8643亿美元。

(二)从对内投资为主向加大对外投资转变,产业外迁压力加大

英国对外投资在19世纪中叶快速增加。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海外放款存量达到1.6亿英镑左右;50年代初,快速增至约2.5亿英镑;但在此之后到1870年间,英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年均2900万英镑。1860—1870年,英国对外投资的50%以上流向欧美,对外投资规模逐渐超过国内投资。到1870年,英国海外投资已达7亿英镑左右,其中超过1/4投向美国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对外投资达到历史高峰。到1913年,英国拥有价值约40亿英镑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资产总计不足55亿英镑。英国对外投资为美国等潜在竞争国工业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高端设备,但此消彼长,英国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大幅收缩,严重抑制了英国工业发展。在1914年前的25年里,英国国内资本形成额已远不足以

让其生产设备更新,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运转。以铁路建设为例,1840—1850年,英国共开通铁路6000英里,与美国大致相当,而1870—1880年,英国仅开通铁路2000英里,不足美国同期的10%。

美国在19世纪末逐渐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美国国内战争后,大量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在1869—1875年达到顶峰,占美国净资本比重达到15%。19世纪80年代,美国拥有13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但10年后,美国出现了4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投资进一步加大。1946—1949年,美国对外投资增加了近50%,对外贷款主要是提供给欧洲各国政府。1950年以后,美国大量投资海外制造业,跨国企业争先在海外办厂,为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带来持续的资金支持。1967年,美国对外投资占全球资本支出的55%,对日本等东亚地区的投资快速增长,同时,过多的海外投资削弱了美国国内工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从偏重有形生产向偏重无形生产转变,去工业化压力加大

19世纪下半叶,英国逐渐偏向无形生产,服务业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随着英国财富的积累,英国上层人士逐渐转向金融投资业务,食利者阶级不断成长扩大,依靠前几代所积累的利润和储蓄而生活,逐步远离制造业。在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已无法割舍其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尤其是在美国的扩张,海外收入成为英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并成为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二是由于船舶工业的崛起和军事实力的扩张,英国加强对全世界航运服务的垄断,英国航运总吨位占全世界的1/3到1/2,是全世界重要的航运服务商。航运成为英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带来英国服务贸易的大幅增长。三是英国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力促进了英国金融业的发展,依托伦敦城强势的金融

地位,英国保险等金融衍生服务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在英国约950万人的就业中,1851年仅有9.1万商业雇员;1881年,这一数字超过30万人;1911年,则达到90万人。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渐显。大量过剩资本远离实体经济,1975—1990年,私人固定资产投资转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比例从12%~13%上升至25%~26%,几乎翻了一倍。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66年的26.07%下降到2016年的11.71%,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下降,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才止住下降趋势。

(四)从技术跟随向自主创新转变,技术外溢挑战加大

工业革命后,英国高技术产品输出增加,对外投资加大,对外移民也快速增长,给美国等国家带来了先进技术。铁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来自英国的先进技术传入美国后,被大规模用于工业发展,迅速推动了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崛起。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美国仍处于技术跟随的阶段,主要依靠产业化欧洲的先进技术推动本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以汽车为例,德国人奥托于1886年发明了内燃机,同年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汽车。随后汽车技术被扩散到美国,很快美国制造出了第一台汽车,并迅速产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大了技术研发投入力度,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扩大。1969年,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在研究与开发上投资的总和是11.3亿美元,而美国则达到25.6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技术外溢压力也逐渐加大,日本等国不断吸收和利用美国技术,并进一步在部分领域超过美国。例如,日本的钢铁行业1951年从美国引进了带钢连轧技术,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技术,研发出转炉炼钢技

术、连续铸钢技术等先进技术,逐步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到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三、世界工厂的分岔路:英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方向及其原因

(一)世界工厂发展的不同方向

英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就被美国超越,而美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之后的100多年依然通过高技术产业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两国制造业在登顶世界第一后尽管面临着一些相同发展趋势和挑战,但两国制造业表现和发展方向却完全不同,美国制造业向高度工业化不断演变,而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美国加快推动高度工业化步伐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汽车、飞机、通信、电子配件等高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二是美国制造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生产生产资料的甲类工业快速发展,占制造业比重快速提升。1982年美国甲类工业占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从1937年的43.8%上升到53.5%。三是尽管美国的制造业份额在下降,但与制造业息息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却是上升的,表明美国的制造业并不是收缩,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调整和延伸。1950—2019年美国制造业份额下降14.4个百分点,但同期信息服务和专业商业服务占GDP比重分别上升1.93个百分点和9.23个百分点,合计提升11.16个百分点,接近弥补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尽管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美国服务贸易在近几十年里一直保持顺差,商业服务、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贡献较大。

相比美国去中低端化,英国制造业则呈现出改造升级停滞化的趋势。以钢铁为例,早在19世纪上半叶,钢铁已成为英国的优势行业,大量出口美德等国家。钢铁制造中的大多数重大创新都来自英国,例如分别于1856年、

1867年和1877年问世的贝塞麦转炉、西门子—马丁平炉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碱性炼钢法。但由于英国钢铁更多转向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殖民地等海外市场,英国钢铁工业在采用新技术上动力不足、动作迟缓,无法跟上美德法等国的创新速度,英国钢铁工业生产率很快被世界主要国家甩在身后,在19世纪末期先后被美德超越。1850年,英国钢铁产量占世界比重接近70%,1870年下降到不足40%,到19世纪末期为世界总产量的20%左右。在汽车、电气和化工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高技术产业领域,英国也都处于落后状态,新技术落地和产业化严重滞后,产业升级步伐停滞,失去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权。

(二)英美制造业不同表现背后的原因

一是包容性增长造就庞大国内市场,很好地支撑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英美人均GDP水平先后快速提升。但相比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惠及各个阶层,中下层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培育造就了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工人工资来看,1780—1851年,在英国工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其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率仅为0.8%。1870—1910年,美国工人实际年工资年均增长2.08%,1910—1940年年均增长达到3.08%,收入增长水平明显高于英国。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远高于英国,1870年,美国的真实工资是英国的1.72倍,1890降到1.63倍,1913年又回到1.72倍。从财富分配来看,英国前10%的人群占有财富总量的比重在1810—1870年为85%,到1900—1910年超过了90%,前1%的人群占有财富的比重则从1810—1870年的55%~60%上升至1910—1920年的70%。1910年,即美国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的初期,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虽然处于较高水平,10%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80%,前1%的人群占有45%,但不平等程度远低于英

国。在此之后,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1930年后美国10%的人群占有总财富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下,直到21世纪开始超过70%,1%的人群占总财富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在如此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下,美国居民能够支付得起汽车等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有力促进了汽车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反,英国国内市场无法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一个深度市场,而由于可以持续开发殖民地、自领地等海外市场,英国也没有动力和压力开发和深耕国内市场。这导致英国高技术制造业市场需求缺乏,很多起源于英国的领先技术,例如苯胺燃料、电报等难以落地和产业化,高层次市场需求不足制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英国逐渐被第二次工业革命边缘化。

二是美国持续推动对等贸易自由化,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也为打入国外市场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起,英国逐渐从保守贸易政策转向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但英国的潜在竞争对手不仅没有扩大开放,反而强化对英国的贸易保护。由于利益集团博弈等原因,英国一直保持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成为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重要市场,英国国内市场孕育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而英国制造业却无法打入高利润的国外市场,改造升级动力和竞争压力严重不足。英国进口关税从1841—1845年的32.2%降至1871—1875年的6.7%。美国内战之后,为保护本国工业,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从1859年内战前的不到20%,提升至内战期间的50%左右,并在此水平维持数十年。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开始大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英国的商品进口。在高关税下,英国对欧美出口大幅降低。举例来说,1840年,欧美市场占英国棉纺织品出口的29.5%,但到18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10%。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逐渐开始主导推动贸易自由化,但美国主导缔造的全球贸易体系

却是互惠互利的。例如,美国在肯尼迪回合之前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低于英国和日本,肯尼迪回合之后也仍低于英国,与日本大致持平。东京回合之后,美国的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仍低于欧共体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三是美苏争霸激发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美国制造业发展有效避免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持续主导国内的技术研发,美国联邦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2到2/3之间。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深入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前沿技术产业化。以集成电路为例,联邦政府不仅在研发上资助集成电路企业,还从需求侧通过军事采购大量购买集成电路产品,促进集成电路早期发展和价格快速下降,从而为集成电路产品的大规模商用化应用奠定了基础。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美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和起源地。而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对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英国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即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国的竞争中优势明显,其自大和保守性滋生,坚信自己的技术优势仍将长期持续,导致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动力不足。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业界和民众对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并无过多担忧,但由于对苏联军事崛起的担忧,美国为赢得对苏联的胜利,不断加大对军备和科技竞赛投入,为美国技术创新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支持,为制造业长期发展储备了一批前沿技术,有效支撑了美国继续主导和引领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

四是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定向打压潜在竞争国战略性产业发展。以半导体为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优势

地位受到日本的严重挑战。1978年,美国半导体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球半导体营业收入的55%,日本仅为22%;1986年,日本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到46%,而美国则下降至40%。认识到这一挑战,美国政府迅速组织起对日本半导体的狙击,对日本半导体发起倾销案,逼迫日本政府对销往全球的半导体实施最低出口价格,并要求将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的外国份额从原来的8%提升至20%。在国内,美国通过放松反垄断法管制和政策支持等方式组织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有力促进了本国半导体企业的创新合作,大幅缩短了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带动了全行业技术进步,很快便形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整体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全面超越日本公司,重新确立了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此外,美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出口和技术扩散的管制体系,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管理,对其核心技术、人才与资源的扩散和流失实施全面管理及监控,以确保其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这种对高新技术的保护并不仅仅针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同样也通过构建等级不同的技术壁垒来防止英国等盟国获取美国的核心技术。

四、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英美制造业崛起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大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英美制造业都从保护国内市场和进口替代开始,通过吸收国际先进技术,逐步培育和壮大本国制造业,提升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进而通过推动贸易自由化等方式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做大做强本国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引起制造业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提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难度大幅增加,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创新内生动力增强,技术外溢也开始显现,也面临新兴国家和老牌工业国的严峻挑战。

在他国贸易保护、本国传统要素成本快速提升,以及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增加条件下,大国制造业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对外投资、产能外迁压力加大。同时,制造业的发展逐步奠定大国在全球军事和货币等领域的霸权地位,给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极大优势,服务业加快发展,去工业化趋势显现。由此观之,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大国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可能会陆续出现和承受贸易逆差扩大、产业外迁、去工业化和技术外溢的烦恼与压力。与英国相比,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控制和延缓了这些烦恼及压力的发展速度,有效防范了这些现象和苗头快速演变成重大风险。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自2010年超过美国以来,占全球比重持续上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接近美日德三国总和。同时,我国制造业也出现了产业外迁、去工业化等现象和苗头。从英美制造业登顶世界第一后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出现这些现象和苗头是国际竞争中大国制造业的“共同烦恼”,但对比美国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我国这些现象和苗头出现过早。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出现了制造业比重下滑的趋势,彼时美国城市化率接近70%,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左右(2010年美元不变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接近6%。而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刚超过60%,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美元现价),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仍在25%左右,均远低于美国同期水平。特别是与当时的美国不同,当前我国制造业附加值不高,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水平,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健全,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卡脖子”技术问题突出。因此,我国必须警惕这些现象和苗头在未来一段时间演变成重大风险,发生英国制造业式的滑落,给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挑战。需借鉴

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和经验举措,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阶段,抓住主要矛盾,做好政策储备,强化风险管控,以双循环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转向。

第一,延缓“退”的速度。即夯实稳固国际大循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平衡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一是要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为本土制造业寻求利润更高、竞争更强的海外市场。强化与美国拜登政府的经贸谈判与沟通,加强与美国各界人士的沟通和交流,与美国探索设立“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基础的中美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探索中美投资合作新模式。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高水平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增加鲶鱼效应,激发和提升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警惕在追求对外开放中出现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风险,强化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二是要推进制造业升级改造,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通过破除垄断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制造业企业竞争,激发企业创新和改造升级的内生动力。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工程,打造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石化、纺织服装和机械等优势产业,提升和再造优势产业竞争力。三是要平衡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促进内外双循环联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相关产业分阶段、有重点“走出去”,引导国内企业加强境内境外双重布局。

第二,以“进”补“退”。即大力构建国内大循环,持续推动高度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提升服务贸易水平。一是要畅通国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制造业效率效益提升为导向,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和商业化等全流程一体化,推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全过程畅通。特别是要加

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保障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加快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深挖内循环市场需求潜力。二是要建设全球领先的高技术制造业市场,加速内循环新技术产业化。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聚焦重点科学问题和与产业技术难题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具有公益性质的研发项目,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为制造业未来发展储备一批前沿技术。加大公共部门采购力度,为新兴技术产业化提供应用场景。三是要鼓励重点领域优势企业建立研发和营销体系,强化对全球市场和营销网络的掌控,提升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加快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贸易水平,弥补货物贸易的增长放缓。

第三,保持产业政策的战略储备,应对重点行业潜在国家竞争的挑战。当前,我国制造业加快从后发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产业政策的适用条件和应用场景正在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产业政策,放弃政府对战略型产业的支持。未来仍需建立国防安全和技术创新等领域重点行业的产业政策储备,动态跟踪和评估这些战略型产业的发展情况,当潜在国竞争压力加大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强化对本国战略型产业的市场保护、技术研发支持和技术出口管制。相应地,还需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技术产业和领先行业的技术管制体系,减少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外溢,保持对国外的技术领先优势,维持和夯实我国战略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摘自《体制改革》2021年第8期)

张雅丽/摘编校)

作者简介:任继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书推介

《争鸣与反思：〈资本论〉若干问题探析》
俞可平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A811.
23/16

资本论主要讲述资本在现实中各种具体形态的运动过程，而本书围绕文本中存在的若干争议性问题展开辨析，其中包括著名的转形问题、市场价值不确定的问题、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否真的成立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到底有几个的问题、纯粹商业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西欧农奴制衰落动因等八个问题。

《面对死亡的人》菲利普·阿里耶斯著 商务印书馆 2015 B08/37

本书分为人皆会死、自身之死两部分，主要包括：被驯服的死亡；圣陵旁，教堂中；死的时刻生的记忆；对彼岸的担保；卧像、跪像与灵魂等。

《先秦气论思想新探》王小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B220.5/12

本书以先秦气论思想之整体为研究对象，在“回到中国哲学自身”之学术口号下，借助于出土文献等相关材料，得出气论思想是先秦诸子讨论宇宙问题（即天道问题）的基础理论的结论，更是天道所以能沟通人事（社会和人生问题）的中介，并主张气论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思维模式，既是儒道的共同理论基础，又是儒道内在超越进路得以实现的理论保障，对后世哲学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为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础和核心，对中国哲学及其历史学科之主体性和民族性、现代性之挺立，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和价值。要之，“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先秦气论思想，既不是被限制在只关乎物质实存性的宇宙论论域，也不是被定义为与“仁学”相对立的另一主线思维，而是贯

穿宇宙论和人生论两方面的整体联系性思维，即呈现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主要被中国古代先哲用来描述和解释世界总体及人生的意义、价值。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杨国荣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B248.25/7

本书作者从一个新的视野出发，对阳明心学展开多维度的阐释，思路开阔，创见颇多，具有开拓性。尤其从“存在”的维度上阐明阳明心学的个体性特征，进而提出“存在意义”的转换问题，明确肯定阳明心学将情感、意志视为主体应有的规定，这都是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又从阳明学关于“心体”“本体”与“工夫”等方面所表现的二重性引出其演变分化的历史叙述，得出阳明形而上学的消解过程完成于黄宗羲的结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前后后》朱佳木著 人民出版社 2020 D220/46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小丛书》中的一本，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标志着改革开放起点的重大历史性会议，清晰呈现了其历史面目，详细论述了其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中国政治学四十年》俞可平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9 D6/29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评述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包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重点研究领域、重要分析概念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着重评析政治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发展状况，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文化、比较政治研究和中国政治研究。全书采取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在史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学40年的发展做出分析

和评估。书末收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政治学发展大事记”。

《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周飞舟、谭明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D63/96

本书主要考察中央地方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及其与城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联系。在大量经验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和九十年代的分税制是理解中央地方关系变迁的关键要素。

《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D751.6/2

本书讨论的是中世纪以来的国家理论,一部中世纪政治史的经典之作。国王有两个身体,自然的和政治的:自然的身体终有一死,政治的身体却是国王神圣职责的象征,使得君主权在君主死后仍具有延续性。作者采用了大量历史文本和图像材料,讨论了近代联邦国家如何用象征手法建立起主权的概念并初步形成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深刻追溯在这背后的中世纪政治理论和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用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D923/12

《民法典实用版》收录了202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全文,对全部法条加注了总结性的条旨,就其中重点条文进行专业的注释加工,包括就条文含义进行解析,添加关联法律规定的条文链接,以及附加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

《文化与制序》韦森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F091/10

本书对经济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文化概念,文化与制序的关系,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系看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等,凝结了作者对文化与制序关系的思辨和历史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本书是作者对文化与制序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反思等。

《这不科学:如何科学地思考伪科学》(美)小西奥多·席克、刘易斯·沃恩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G301/55

本书深入思维层面,运用逻辑原理求证如今被大众广泛追捧的超自然现象,分析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告诉你伪科学之所以不科学的原因,一举击碎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幻象。此外,运用独创的“查究公式”拆解实例,教你掌握比大多数人更理智的思考能力,依靠自己做出科学、理性的判断。

《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田禾、吕艳滨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F12/30

本书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梳理半工半耕的小农家庭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非正规经济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祖先》安森垚著 九州出版社 2019 K12/5:4

本书是一本关于世界史知识的读物。作者从地理的视角和人类遗传分子学来解读人类的文明史,从遍布世界各地的晚期智人说起,讲述世界各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讲述分两条线,一条是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明,一条是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等为主的西方文明,按历史进程将东西文明穿插进行比较,以期能让读者以更高、更宽、更远的视角看待世界文明史。

《清史三百年》戴逸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K249.09/5

本书是我国著名清史、近代史专家戴逸先生对清史做的一个梳理,按时间顺序讲述了清代三百年的发展,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内容包括:三百年清史的八个阶段;清朝的统一;清朝盛世的高峰等。

(戴慧英/摘编 张雅丽/校)

2021年《教学参考》总目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新四化”同步实现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1-1)/ 深刻认识擘画“十四五”时期发展蓝图的理论创新(1-5)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建党10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

理解“守的是人民的心”的深刻意蕴(4-1)

◎马克思主义研究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8)/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与形态(2-1)/ 用正确历史观看百年党史(2-7)/ 马克思“美好生活”观及其中国意义(5-1)/ 马克思主义成为生活方式:问题与应对(6-1)

◎党建研究

韧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1-13)/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2-11)/ 制度视角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本内涵与关键要素(3-1)/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表述(4-4)/ 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5-7)/ 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百年历程(5-11)/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6-7)/ 党内法规建设的源头及历史影响(6-16)

◎政治法律

全方位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2)/ 乡村权威再造:基层政治的一个经验解释(1-27)/ 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基本内涵与建设逻辑(2-17)/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3-8)/ 百年大党领导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成就(4-1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关联(4-15)/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内涵(5-16)

◎经济论坛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36)/ 双循环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现状、挑战及保障路径(2-25)/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统一战略基点与战略方向(2-35)/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3-18)/ 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路径(3-26)/ 加入WTO20年:中国与WTO

互动关系的演进(3-30)/平台经济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4-22)/论“两山”理念所蕴涵的经济文明思想(4-32)/当前民营经济认识的误区与辨析(5-19)/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标准、现实差距与未来努力(5-25)/新时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指南(6-21)/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思考(6-26)

◎“三农”问题

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1-44)/相对贫困研究与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41)/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研究(4-37)/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的路径选择(6-33)

◎管理世界

领导干部要善于化解情绪心理危机(1-52)/加强“需求侧管理”的重点和方向(2-49)

◎国企改革

论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正确认识的几个基本问题(3-38)

◎社会学

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新阶段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3-43)/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6-41)

◎热点追踪

全球供应链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3-46)/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4-43)/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方法路径(4-51)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5-33)/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5-41)

◎他山之石

日本双循环经济对我国的启示(2-52)/从国家本位到市场化:德国公共服务的发展与启示(3-51)/美国基础设施融资机制对我国新基建的启示(4-53)/加拿大数字政府治理改革实践及反思(5-50)/世界工厂的挑战与应对:基于英美制造业的比较研究与启示(6-47)

(张雅丽/编校)

聚焦学科前沿 服务教学科研

JIAO XUE CAN KAO

教学参考

2021 年第 6 期(总第 692 期)

2021 年 12 月 25 日编印

主 办: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编 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

排版印刷:甘肃金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编:730071

电 话:(0931)7768718

邮 箱:gsdxtsgckzx@126.com

印 数:1~1000 册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 456 号